Growth
Research
Programme

中非关系已趋成熟？ 发展、变迁与恢复

UNIDO

《DEGRP 政策解析汇编》汇集全球顶尖学者与决策者对低收入国家发展政策的崭新思考。

degrp.sqsp.com

@degrp_growth

现行政策与研究时评

Linda Calabrese (主编)

2016年5月

译本备注

本文件为源文件中文译本，源文件为英文版，可访问以下网址获取：<http://bit.ly/2aPVlYo>

如果英文版源文件与中文版译本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以英文版为准。

关键信息	4
引言	5

会议发言与评论 7

1 如何加速推动非洲工业化与经济转型	8
2 为何放眼非洲：广阔市场、专门技术和比较优势	13
3 中非合作论坛的两项新承诺何以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17

中国投资和非洲经济增长 19

4 非洲如何打破资源依赖陷阱？构建工业发展联系	20
5 中国制造业走进非洲：趋势、挑战和机遇	24
6 中国企业和非洲就业动态	27
7 中国与南非在金融服务行业携手合作	30

拓展多领域合作：贸易往来和环境保护 33

8 开展中非环境保护和海上贸易互利合作	34
9 了解中非自然资源贸易中的非正规性	6
10 从依赖采掘行业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演变	39
11 无人问津？中非关系发展背后的环境隐患	42

治理、制度和外交 45

12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中国给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启示	46
13 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演变	50

结论	53
----	----

注释和参考文献	55
---------	----

关键信息

2015 年 12 月 3 日，英国国际发展部-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 (DFID-ESRC) 发展研究项目组 (DEGRP)、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连同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 英国)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讨论 DEGRP 中非关系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此次会议与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第二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同步举行，集中讨论了以下三方面内容：

- 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角色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非洲经济和非洲总体发展的影响；
- 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在中非贸易中的作用，包括告别自然资源依赖型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机遇；以及
- 国家治理、和平和安全方面的问题。

此次会议旨在增进对中非关系复杂性和中非往来互利共赢的认识。会上重点探讨了非洲国家可如何积极与中国合作，以期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和发展。

本汇编即此次会议讨论成果。本汇编收录了北京大学教授兼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主旨演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亲善大使海宇的演讲。另外，本汇编还收录了来自 DEGRP 中非关系研究员和 SAIIA 与 ODI 研究员的投稿、以及来自 ODI 的其他投稿和参会代表的评论。

会议主要内容：

- 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为非洲国家创造了巨大机遇，非洲国家可抓住这些机遇，致力转变其

经济模式，实现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制造业等高附加值经济的转型。

- 中非双方可相互学习借鉴，在私营和公共事业领域积极开展南南合作。
- 中非之间的强有力合作将拓展至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平和安全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需与现有非洲举措相协调，确保实现国家和区域相关目标。

如欲了解更多会议信息，包括网络广播和媒体采访链接，请登录 DEGRP 网站：<http://bit.ly/24NSYii>

DEGRP 关于中非关系的研究

2015 年，DEGRP 启动中非关系研究项目，旨在研究和评估中非合作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转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机遇和启示。该项目涉足五个研究领域：

-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 - <http://bit.ly/1OTDuRg>
- **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和非洲石油生产商的经济展** - <http://bit.ly/1FK0Gfy>
- **中国企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就业动态** - <http://bit.ly/1J9LuZf>
- **自然资源、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和中非贸易** - <http://bit.ly/1KkaRIS>
-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和非洲结构转型** - <http://bit.ly/1KnDXvg>

请观看采访 DEGRP 中非研究员的系列短片：

<http://bit.ly/1MvmbIR>

引言

Linda Calabrese, 海外发展研究院

不断变革的中国经济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自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 GDP 增长率在屡经高达两位数的长期高速增长后，已开始放缓。从 2011 年开始，中国 GDP 增长率低于 10%（世界银行，2016），而预测在未来几年将仅介于 6%-7% 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同时，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实现中国经济从出口投资主导型向家庭消费主导型之转变（Huang，2013）。

这些变革可能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后，商品价格因中国投资而得以维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但经济发展放缓势必导致投资减少，从而可能引发价格回落（Bremmer，2015）。同时，中国经济正逐渐摆脱对于制造业的依赖，伴随着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的迅速膨胀（Barton 等，2013），必将拉动消费品的进口。

中国在调整国内经济的同时，也期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一带一路”倡议（OBOR）提出建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通道，以期促进中国与亚洲、欧洲和非洲 60 多个国家的贸易往来（Hofman，2015；Johnson，2015）。这一倡议将使这些国家能够以更低的门槛进入区域和全球市场，有望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关系。

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变革已对其主要贸易合作伙伴非洲产生了一定影响。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量

在不断减少。但中国的经济变革同样也带来了机遇。林毅夫 (2011) 提出，如果中国向更高价值链攀升，将使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 8500 万个。而低收入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只要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适当政策，即可弥补由此导致的缺口。

“一带一路”倡议也将助力非洲经济发展。东非港口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连接肯尼亚、吉布提、埃及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Olander 等，2016），对港口道路和铁路基建的投资也将促进非洲大陆贸易发展。

换言之，虽然中国的经济变革对非洲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非洲国家可积极与中国开展合作洽谈，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非洲国家不仅可从双边贸易和投资中获益，还可参与制定合作条款和条件。

埃塞俄比亚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 (Meles Zenawi) 就曾积极鼓励中国投资商在该国建立轻工制造业公司（中非博客，2012）。无独有偶，卢旺达政府也始终欢迎中国投资商，以期促进该国出口，实现出口多样化，并为此在基加利建立了一家中国服饰工厂（Namata，2014）。同时，非洲也在向中国投资，按美元计算，南非在华投资甚至超过中国在南非的投资（Gelb，2014）。

此外，对于如何在其领土范围内与中国开展合作，非洲国家拥有关键发言权。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在非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受东道国政策和法规以及地方政府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影响，而中国政府法规和方针的影响力反而在其次（Weng&Buckley，2016）。

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第二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正是在这样复杂背景下举行的。峰会于 2015 年 12 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也是中非国家首脑和政府官员的最近一次会晤，旨在建立并维系中非之间的强有力合作。

峰会议程十分紧凑，涉及从农业到和平安全等多个领域的议题。在峰会尾声，审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该行动计划详细列明了各方为加强合作将采取的行动。

除了树立宏伟目标之外，该行动计划还声明了各方对提供额外财政支持和建立更有力执行机制的承诺 (Carey & Li, 2016)。中方承诺：扩大对非投资规模，力争到 2020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由 2014 年的 324 亿美元达到 1000 亿美元；提供更多普惠贷款；增资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为促进对非投资而设立的股权基金）；以及设立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于 2016 年 1 月正式启动，旨在为制造业、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金融支持。

本套政策解析汇编汇集了出席 2015 年 12 月 DEGRP/SAIIA 会议的数位中非专家的演讲以及 ODI 和 SAIIA 研究员的投稿。这些文章提供了对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议题的深入洞察和对当前重要问题的精辟分析。

在第 1 部分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分析了工业化对非洲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可如何支持工业化进程。UNIDO

亲善大使**海宇**分享了她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制鞋厂的经验，以及该鞋厂在打造非洲生机勃勃的全新制造业中发挥的作用。**Hannah Ryder** 评述了精确数据对中非合作的重要性。

第 2 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投资为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Giles Mohan** 探讨了非洲经济体借助大宗商品出口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可能性。**Deborah Brautigam** 分析了哪些类制造业公司已进占非洲市场及其分布趋势；此外，还分析了这些投资与当地经济互利合作的机会。**Carlos Oya** 和 **Terry McKinley** 则将目光集中在中国对非投资在就业方面的影响。**Stephen Gelb** 重点介绍了中非当前在金融服务领域开展的合作。

第 3 部分论述了中非投资以外领域的合作考察了双方在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深化合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吴御瑄**重点介绍了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如何为海上贸易合作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合作开辟全新合作空间。**翁晓雪**强调了理解中非自然资源贸易中的非正规性这一在高层对话中往往被忽视的问题的重要性。**Ross Harvey** 深入分析了非洲国家如何应对中国给商品市场带来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潜在环境影响。**Roger Calow** 则关注了中国制造业迁至非洲的环境风险，尤其强调了生产过程中‘隐性’消耗的水资源的问题。

第 4 部分重点介绍了政府治理、政策制度和外交活动在塑造中非关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宋丽娜** 分析了中国政府简政放权经验为寻求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非洲地方政府提供的启示。**Dan Large** 概述了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历程。

会议发言与评论

UN PHOTO/EVAN SCHNEIDER

1 如何加速推动非洲工业化与经济转型

林毅夫，北京大学

2 为何放眼非洲：广阔市场、专门技术和比较优势

海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亲善大使兼非洲制造计划首席执行官

3 中非合作论坛的两项新承诺何以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Hannah Ryder，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1. 如何加速推动非洲工业化与经济转型

林毅夫，北京大学

主旨演讲，DEGRP/SAIIA 会议，
约翰内斯堡，2015 年 12 月 3 日

摘要

林毅夫在其主旨演讲中提到，工业化对非洲结构转型至关重要。演讲中，林毅夫列举了东亚和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当前的成功事例，强调了健全的工业政策、务实的目标设定以及可信的政治承诺对实现持续变革的重要性。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仍在贫困中挣扎。但贫困并不是注定的。1952 年，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与现在的非洲国家一样贫穷。但现如今，中国已发展成高收入经济体。1979 年，中国人均 GDP 还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分之一。如今，中国已步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并有望到 2020 年左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无独有偶，东亚许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故事也如出一辙，韩国就是其中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后殖民经济体中最贫穷的一个。而现在，韩国已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说明，几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可能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而一跃成为中高收入国家。

追溯历史，全球各国都曾经历贫穷，即使当今的高收入国家亦不例外。这些国家在贫穷时期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依赖农业维持生计。全国约 9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依靠农业为生。如今，这些已摆脱贫困的国家也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经历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而后步入后制造业的发展阶段，实现收入的不断提高。

非洲国家之所以仍处于贫困当中，原因就在于他们尚未完成这一转型过渡。目前，非洲国家 75% 以上的出口商品仍集中在农产品或原材料。政府财政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但资源市场往往受到经济起落的影响，因而市场波动很大，生产力水平也低下。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现农业主导型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出台相关产业政策。

助力转型的产业政策

结构转型方面，必须有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这些人势必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第一批项目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他们将承担所有损失，但同时也将为其他人传递一个讯息：“我们的准备还不够充分”，或是“这个方向不对”。这样一来，其他人就可避免类似错误。如果成功，他们就会吸引他人的争相效仿。在竞争中，第一批成功的企业将不再占据垄断地位，因而失败的教训与成功的收获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对等关系。

但无论最初的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会为其他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没有这批人，结构转型就是纸上谈兵。因此，政府需为他们提供信息贡献补偿。

他们的成功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创业能力，还依靠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套的协调发展。例如，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型需要物流、电力、道路、港口设施等方面的相应优化升级。这些优化升级不可能由单一制造投资商完成。此外，制造设备投资远高于农业设备投资。因此，需要有金融机构来调配投资所需的财政资源。同样，还需设立有关机构来共同承担新兴产业带来的风险。创业者仅凭自身无法实现这些财政资源方面的优化升级。政府需让私营企业参与其中，或进行宏观调控，以协调这些变化。

政府如要发挥好这一作用，必须制定产业政策，细化到各个领域，进行协调和调整。不同领域对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需求各不相同。例如，农业需求灌溉资源，而工业领域则需求电力设施。

如果政府拥有无限资源，则其大可以对软硬件基础设施进行全面优化，但资源是有限的，执行能力亦然。因此，政府需要布局谋划，确定预大力发展的领域和亟待建设的思软硬件基础设施，据此采取相应行动。

制定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如要行之有效，需满足下述要求。

具有潜在比较优势

政策应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换言之，这些行业的可能生产要素成本最低，符合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生产要素成本应当为全球最低。

SAIA/WILLEM DE LANGE

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大小由总成本决定，而总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生产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由软硬件设施决定，软件设施包括制度和商业环境。如果硬件设施不足，商业环境不成熟，交易成本将激增，即使生产要素成本低廉，总成本仍会居高不下。

产业政策应当帮助优化商业环境、完善制度体系，同时改善硬件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成本。

设定务实发展目标

过去曾有过产业政策方面的多次尝试，但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这些产业政策目标过于高远。他们瞄准的行业领域往往看似很前沿，但实际上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这样的产业政策与国家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因此，即使在政府的协助下开辟了相关行业，但生产要素成本却高于在这些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收入国家的生产要素成本。

而在低收入国家，交易成本肯定高于高收入国家，导致总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其产品在开放性市场中的竞争力自然远不及高收入国家。如此一来，这些行业只有倚赖政府的不断补贴才得以生存。这正是过去许多产业政策终告失败的主要原因。

历史经验

确定哪些行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是摆在理论和政策制定前的一道难题。历史经验有很多可供我们学习借鉴。

16 世纪，英国希望赶超荷兰的羊毛纺织品行业，因此制定了相关产业政策。自此以后，所有效仿该做法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

目前，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有配套的产业政策。

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有何共同之处？我们不妨以韩国和英国为例。首先，以经济充满活力的快速发展国家为参照对象；第二，瞄准这些参照国家的可靠行业；第三，参照国家具有类似资源禀赋结构，人均 GDP 最多高于本国一至两倍，满足这三点的产业政策必将取得成功。

过去大多数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目标设定过高。他们妄想赶超人均收入为本国十倍甚至是二十倍的国家，并以这些国家为参照标准来建设本国行业。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想用十年赶超英国，十五年赶超美国，但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英国和美国的 5%。结果，即便中国建立起了相关产业，但都不具竞争力，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生产因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过高，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大力扶持才能生存。

基于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即可了解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如何选定适当的参照国家。首先，审视资源禀赋结构类似的国家，因为拥有类似的比较优势。如果某个国家连续几十年保持经济活力，那么该国的大部分行业必然与其比较优势相符。

国家如果能保持几十年连续发展可快速积累资本。而过去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失去其原本优势，成为国内的夕阳产业。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与参照国的资源禀赋结构类似，在参照国已步入夕阳的产业可成为该国的朝阳产业——即潜在比较优势产业。

亚洲和毛里求斯经验借鉴

按照这一思路，非洲工业化将迎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腾飞的少数几个国家都是因为抓住了轻工制造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这一机遇是随高收入国家工资上涨应运而生的。

二战后，美国工资水平上涨，所以失去了诸如服装、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等轻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此时，日本抓住这一机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跃成为经济强国。

在经过二十年的迅猛发展之后，最终，日本的工资水平也开始上涨。之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接棒进入轻工制造业，赢得了“亚洲四小龙”的称号。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工资水平也开始上涨，失去了比较优势。中国充分把握机会，在过去的三十年一直保持着迅猛发展的态势。

而现在，中国达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所经历的同样阶段。中国即将把轻工制造业迁至非洲。

非洲国家已经牢牢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毛里求斯。20世纪60年代，毛里求斯贫穷落后，但现在已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

毛里求斯是如何获得成功的？20世纪70年代，台湾和香港工资水平上涨，毛里求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并积极邀请台湾和香港的纺织与服装制造企业将工厂迁往该国。现在，毛里求斯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从一个单一依靠制糖业的经济体一跃成为非洲工业化的成功典范。

工业化的新机遇

中国的崛起将为非洲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20世纪60年代，日本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970万人。80年代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工人230万人，台湾150万人，香港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而中国目前单在轻工制造业雇佣工人就达8500万人。不久以后，这些工作岗位将迁至其他低收入国家。这一发展思路是否同样适用于非洲？我们能否借鉴过去的经验，复制出相同的快速发展之路，促进非洲的结构转型？

很高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亲善大使兼非洲制造计划首席执行官海宇也在现场。她帮助非洲国家抓住机遇，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在极短时间内就缔造了两次成功。第一个成功案例是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华坚鞋厂。

埃塞俄比亚制鞋业

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我就已开始推行上述做法，并提出非洲国家可利用的种种机会。令人振奋的是，埃塞俄比亚时任总理 Meles Zenawi 听取了我的建议，于2011年出访中国，进行投资推介，并邀请华坚鞋厂将生产工厂迁至埃塞俄比亚。

在海宇女士创业精神的带动下，该鞋厂仅在2012年一年就快速为当地创造了2000个工作岗位，并使埃塞俄比亚出口至全球市场的鞋类产品数量翻番。到2013年年底，新创4000个工作岗位。2012年之前，没人相信埃塞俄比亚能为全球市场生产轻工制造业产品，但华坚鞋厂的成功案例让人们相信这一切皆有可能。

现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也懂得抓住机遇：2013年，当地政府在亚的斯亚贝巴周边建立工业园，园内可容纳 22 个工厂。所有厂房在三个月之内就全部租给了轻工制造业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均出口到全球各地。国际买家也纷至非洲，因为他们发现非洲的生产成本远低于中国，而且从非洲的低收入国家进口商品能享受免关税优惠。

卢旺达的服装制造业

成功的故事不仅仅只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在了解了埃塞俄比亚的成功秘诀之后，卢旺达也想效仿。Kagame 总统积极进行投资推介，并邀请海宇女士前往卢旺达协助建立服装厂。双方达成意向，决定在今年（2015 年）2 月份开始投资，计划招聘 300 名工人。2015 年 5 月，规划和培训工作全部完成，8 月开始出口产品，工人总数达 500 人。现在，该公司已成为卢旺达最大的雇主，但在过去，没人相信卢旺达能成为全球市场制造商。

结论

综上所述，贫穷并非注定的。多元化发展和持续产业升级是创造就业岗位、实现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的蓬勃发展和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将为非洲国家带来机遇。不仅仅是中国，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工资水平上涨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出本国。

非洲国家如果把握机会，一定会像东亚部分国家一样快速蓬勃地发展起来。归根到底，所有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从轻工制造业起步，逐步进行结构转型。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见证非洲国家抓住机遇，像东亚经济体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取得成功。谢谢。

2. 为何投资非洲：广阔市场、专门技术和比较优势

海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亲善大使兼非洲制造计划首席执行官

主旨演讲，DEGRP/SAIIA 会议，
约翰内斯堡，2015 年 12 月 3 日

摘要

海宇在演讲中分享了她在非洲投资的经验，介绍了她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制鞋厂、在卢旺达建立服装厂以及与加纳、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政府商讨相关事宜的经历。本精彩选段收录了她对埃塞俄比亚制鞋厂成功原因以及投资商在非洲投资经商原因的反思。

引言

2011 年，我第一次来到埃塞俄比亚，当时我任华坚鞋业集团副总裁兼总经理。从决定投资制鞋业到投产出口，我们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到第一年年底，我们就招募了 2000 名当地工人。到第二年年底，我们的工人人数已达 4,000 名。

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名为东方工业园的的工业园区。2011 年之前，该工业园就已花了五年时间在全球招商，才吸引了一个制造商来此投资建厂。

在我们为当地创造了 4000 个工作岗位之后，埃塞俄比亚政府邀请我们与其携手推广亚的斯亚贝巴的首个国有工业园 Bole Lemi。不到三个月时间，整个工业园入驻完毕。工业园迎来了来自印度、土耳其、孟加拉国、香港、泰国等全球各地的国际制造商的入驻。成功的秘诀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利用成功的连锁效应复制成功。

我们将投资商引入园区，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优势，阐明业务操作模式以及运营理念。他们立刻就签了合同。同年，即 2013 年，鉴于一期项目的巨大成功，世界银行出资 2.5 亿美元支持 Bole

Lemi 工业园二期开发。这是世界银行自其成立以来首次支持工业化项目。

投资非洲，原因何在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埃塞俄比亚？首先，我想和诸位分享的就是，不是我们选择了埃塞俄比亚，而是埃塞俄比亚选择了我们。故事可追溯到 2011 年 3 月，当时林毅夫先生和已故总理 Meles Zenawi 进行会谈，期间 Meles Zenawi 总理谈到了三点。第一，消除贫困——林毅夫先生建议，消除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创造就业。第二，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还是 20 世纪 60 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根本原因都在于这些国家抓住了工业化转型的窗口机遇期，顺势创造了上百万的工作机会。因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快速启动经济转型。

第三，Meles Zenawi 总理询问，埃塞俄比亚应如何仿效这些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林毅夫先生回答道：“首要任务是树立快速致富的典范，这将给贵国甚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灵感和信心，同时培养卓越领导力，为今后积累丰富的经验。”

这仅仅是故事的开端。6 个月后，Meles Zenawi 总理采纳了林毅夫先生的建议，并前往中国为埃塞俄比亚招商引资。继这一成功典范之后，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见证了非洲逐渐走向工业化的进程。

远见卓识和有力领导促成了这一切。但这种发展是可持续的吗？私有企业来非洲的目的不是无偿援助，而是期望拓展业务，通过业务往来实现发展目标。要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投资行为的背后一定要有明确的商业因素作支撑。

对此，我们要说说这些私有企业的供应链。他们的供应链由三部分组成——制造商、经销商和零售商。他们选择来非洲拓展业务的原因何在？

劳动力和物流

首先，我们看看制造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22%。在中国，单个劳动力成本约为 500

美元。而在埃塞俄比亚，仅 50 美元。一直以来，人们存在一个误解，认为非洲的劳动力虽然低廉，但效率不高。事实确实如此吗？当然不是。

我第一次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参观了当地的一些制造企业，询问他们的工人效率如何？他们告诉我，发工资的第二天，就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擅自离职，径直消失了。十五天后，这些工人把钱都花光了，才又回来工作。

效率十分低下，所以，虽然这里的工资成本低，但不适合投资。二三十年前，我们在中国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找到了解决之道，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培训。因此，当我再次来到埃塞俄比亚投资时，我带来了有效的培训方法，成功将效率提高至 70%，这也就意味着，直接劳动力成本从 22% 下降至 3%，节省了高达 19% 的成本。

过去，很多人认为，非洲基础设施不完善，还没做好工业化的准备。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工厂每个月要从埃塞俄比亚出口 12 箱成品货物至美国。为此，我要进口 8 箱原材料。让我们来算一笔账。

在中国，物流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2%。出口 12 箱货物需要进口 8 箱原材料，因而物流成本翻了四番，达 8%。也就是说，物流成本比中国的多出 6%。而劳动力成本节省了 19%，减去多出的物流成本 6% 后，还是节约了 13% 的成本。

这也是我今天要说明的第一点，按非洲的基础设施现状，投资这里的制造业是有利可图的。这就是投资行为背后的商业因素。优势已经存在，如果基础设施也配套跟上，非洲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商。

低进口关税带来贸易优势

生产成本降低只是优势之一。进口关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今，非洲仅占全球 GDP 的 2%。非洲必须向 GDP 占有量更大的市场，即美国和欧洲，出口商品。美国和欧洲的 GDP 均超出全球 GDP 的 20% 以上。如果非洲希望和中国一样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就必须将目光投向这两大市场。

美国和欧洲经销商已逐渐将订单合作从亚洲转向了非洲。随着中国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涨，经销商要求工厂让利 5%。但中国制造商纷纷拒绝这一要求。如果经销商把订单交给非洲制造商去做，根据《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和 EBA（除武器外一切都行）协定，许多商品仅进口关税一项就能节约 37.5%。实际上，相较于生产利润，这一优惠带来的利润更大，这也是投资非洲的第二个优势。

全新零售采购策略

供应链的最后一环是零售商。在金融危机之前，

欧洲大型零售商一直奉行他们称之为 20-80 的采购策略，即，从国内采购 20% 的物资，从中国和孟加拉国等远东地区采购剩下的 80%。在金融危机时期，欧洲购买力缩减。零售商无法按照预期进度销售商品。商品经常滞售长达六周之久，而从中国进口的大量货物尚停靠在欧洲港口等待接收。所以，他们不得不将滞售商品打折甩卖，为停积在港口的大量商品腾出空位，从而避免为集装箱停泊港口支付高额费用。

在金融危机之后，许多零售商发现，曾经的 20-80 采购策略业已失效。他们开始寻找更近的市场。很大一部分零售商开始转而采用 40-60 采购策略，并积极寻求新产区。在埃塞俄比亚，不乏世界知名的零售商竭力与当地工厂签订合作订单。过去的困扰通常是，当地工人不知道如何生产国际制造订单产品。但世事并非一成不变，一切皆有可能。

成功的关键：广阔市场、专门技术和比较优势

我在埃塞俄比亚创建第一个制鞋厂期间，曾前往直意大利与一家意大利知名鞋类品牌洽谈合作事宜。我请求将他们的订单交给我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厂去做。老板婉言拒绝。他说，十年前，他也曾试着将订单交给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工厂做，尽管成本低廉，但产品质量却无法达到国际标准，而且无法按时交付。于是，我把手提电脑中的工厂视频展示给他看。

我注意到他眼中光彩流动：他为所看到的巨大变化而惊叹不已。制鞋厂成功的诀窍在于合作“三角”。

合作三角指什么？这三角分别是：全球市场、亚洲制造业专门技术和非洲当地的比较优势。每个

非洲国家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埃塞俄比亚的比较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和电力成本。塞内加尔的比较优势则是海运便捷，乘船到欧洲和美国只需七天；尽管劳动力成本略高，但节省了时间。一旦确定自身优势，将其与其他要点相结合，就形成了合作三角。我目前进行的非洲制造计划也同样本着合作三角的原则。

投资非洲面临的挑战

在非洲经营制造业务并非易事：一路走来，我发现了不少问题。例如，我第一次来到埃塞俄比亚时，总理向我承诺，开厂使用的所有原材料一律免税。但是，在港口负责货物清关的工作人员并非总理，而可能是个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当地年轻人，收不收税对他来说完全无惯例可循。所以，当我进口鞋刷入关时，港口工作人员坚称，我进口的是牙刷，必须收税。还例如，港口工作人员认为女鞋打孔机看似武器，因而只能滞留在港口。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不得不私下拜访了埃塞俄比亚税务总局局长以及其他六位副局长。然后，我邀请了 20 位政府管理人员在会议室听取关于我在埃塞俄比亚开办工厂的汇报，最重要的是，我向他们表达了我所遇到的难题。之后，我邀请他们参观我们的生产线。

此后，情况逐渐得到了改善。但为什么在一开始困难重重？和许多投资商一样，早先我只是从外界的角度去了解非洲，一般是通过媒体报道。但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迥然不同。

其中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初到埃塞俄比亚时。当时，我与工业部长前往农村

地区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我们亲眼目睹一些儿童正在忍饥挨饿。我代表公司捐了一张 10 万美元的支票。我把支票交给工业部部长，请他为孩子们购买食物。部长看着支票，静默了约两分钟时间，然后将支票还给了我。他说：“Helen，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时的温饱。我希望你能用这些钱购买机器设备，教会我们的人民制造技能，使他们掌握谋生的技巧。”

第二件事是非洲人民并肩携手解决问题的强大意愿。人们总说非洲腐败，但在埃塞俄比亚，我发现只要有困难，我可以随时致电部长，即使是在半夜。尽管部长日理万机，他仍不辞辛苦地在第二天早上 7 点接见我，为我解决问题。作为一名投资商，我亲眼看到埃塞俄比亚有位部长比其他任何人都早到办公室工作，这无疑增强投资商的信心。

非洲企业家精神，何去何从

如果你问我，欧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企业家精神有何不同，我会说：如果你面前有一只老虎，欧洲企业家会说，“看到老虎，先拿手提电脑。意思是，你要全面研究老虎，了解它的个性，并与同事讨论对付老虎的良好策略。”你当然可以做到上面种种，但有可能当你做好了万全准备之后，老虎早就不见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则截然不同。他们会建议，如果你看到一只老虎，赶紧跳上虎背，骑上老虎，掌握驾驭它的技能。我认为，非洲正面临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必须抉择，到底哪一种企业家精神才是最适合的。是错过？还是征服？

如预了解海宇的完整演讲，请观看 DEGRP/SAIIA 会议视频，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AYEV4Lt1I>

3. 中非合作论坛的两项新承诺何以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Hannah Ryde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代表评论, DEGRP/SAIIA 会议
约翰内斯堡, 2015 年 12 月 3 日

摘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驻华代表处政策与伙伴关系主任 Hannah Ryder 就近期发展趋势发表了评论, 提供了有关中非合作的关键数据。

近期, 非洲国家首脑和政府领导人齐聚两大会议。第一次会议是于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第六次峰会。第二次会议是于 2016 年 1 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非盟总部举行的第 26 届非洲联盟 (AU) 峰会。非盟总部由中国于 2012 年援建而成, 象征着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关系日益深化。

两次峰会之余, 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就 HIV 和 AIDS、妇女权益以及环境保护等议题举行了多场“分会”。DEGRP/SAIIA 研讨会就是其中之一, 会上探讨议题广泛, 视角多元, 引人深省。与会者就工业化、维和等议题发表演讲, 褒贬不一。

gais/flickr

目前，中非关系研究领域始终缺乏来自多国的有力数据来推动和加强研究力度，这一议题在会上被多次提及。各方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Deborah Brautigam 在发言中提到了中国在多个非洲国家的最新投资情况，其中的数据信息均来源于在当地的实地考察。作为与会代表，我也带来了相关数据。会上，我援引了 UNDP 近期发表的报告 (2015)，该报告通过几项案例研究对中国和非洲经济特区进行了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

尽管中国在非合作项目的数据收集和获取比之以往更容易，但仍不足。没有相关数据，无论是分析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还是规划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MOFA, 2015) 中针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两项新增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计划第 8.2 条中的第一项新增内容，提到了双方承诺系统地进行信息收集和回顾，掌握中非合作论坛达成的协议是否落实以及落实情况如何。通过借鉴中非合作论坛 15 年来的经验，实现上述目标。计划第 2.4.6 条的第二项新增内容，提到了中

方邀请非盟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计划。该项承诺也曾出现在此前的中非合作论坛协议中，但最新版本中的承诺力度比以往更强。

上述承诺对中非关系数据的收集和传播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在北京设立非盟代表处，非盟就能参与收集有关中非合作论坛协议落实情况的数据。直至最近，非中国籍办事人员一般是很难获得中方数据的。此外，如果这些信息数据能公开，就能有力地佐证或反驳学术界和媒体圈对中非关系的种种臆测。

在这一理想情形实现之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商业届和非政府组织必须持续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互通观点看法。DEGRP 等项目和 SAIIA、UNDP 等组织可继续提供支持，汇总各类数据、比较分析和观点，例如，从中国企业或其他实际参与者获取相关信息数据。非盟驻北京代表处如期设立之后，UNDP 可发挥协调作用，协助中国政府和非洲国家在京办事处代表收集数据。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应当持续跟进，放眼未来，瞄准在中非合作论坛和非盟峰会等系列会议上可能出现的机会。

中国投资和非洲经济增长

UNIDO

4 非洲如何打破资源依赖陷阱？构建工业发展联系

Giles Mohan, 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5 中国制造业走进非洲：趋势、挑战和机遇

Deborah Brautigam,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6 中国企业和非洲就业动态

Carlos Oya & Terry McKinley,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7 中国与南非在金融服务行业携手合作

Stephen Gelb, 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 英国)

4. 非洲如何打破资源依赖陷阱？构建工业发展联系

Giles Mohan, 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摘要

许多非洲经济体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传统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经济基础不稳定，不利于广泛发展：过度依赖商品贸易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冲击的影响；而且，一些资源依赖型非洲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受到工业贸易伙伴的剥削。本文探讨了通过搭建高效联系借助大宗商品出口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可能性。

引言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 7.4%，但根据当前预测，已下滑至 7% 以下。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具体体现在出口数据下滑（Elliott & Inman, 2015）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Alfred, 2015）。中国政府推出相应举措，人民币贬值 4%（Brautigam, 2015），同时降低基准利率（Wei, 2015）。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非洲部分商品的需求下滑，这将非洲长期以来对资源过度依赖的问题重新带回人们的视线。一些非洲国家对中非贸易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过度依赖，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连锁效应，人们对此十分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了 2015 年非洲经济增长预测，从 4.5% 下调至 3.75%（英国, 2015）。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Razia Khan 最近表示，非洲国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在全球经济遭遇逆风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外部压力”（Nkabinde, 2015）。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成员 Aubrey Hruby 表示，鉴于中国经济放缓，非洲政府要认识到，“依赖于利好的经济环境，满足于低下的市场效率，如今已不是明智之选”

（Hruby, 2015）。显然，非洲政府需要加快落实经济转型计划。

充分利用大宗商品出口

非洲在资源依赖型经济下，如何利用大宗商品行业推动工业化进程？在多数传统观念看来，大宗商品行业与广泛发展之间的联系并不被看好。有些人认为，中国与非洲在资源领域的合作，反而加深了非洲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充当原材料供应国的一贯角色（Okeowo, 2013）。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如果要在非洲推行 Hruby、Khan 等人提倡的经济转型模式，我们需要更细致地了解这些动态因素。

开放大学和开普敦大学于 2008-2012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正是加强此类了解的范例。“充分利用大宗商品”项目通过对非洲多个资源依赖型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探索了在资源领域之外建立合作的可能性，并尝试解决以下核心问题：非洲国家能否形成以资源开采促进工业发展的良性联系以及如何搭建这种良性联系。分析参考了一系列针对非洲国家多个大宗商品领域的案例研究。普遍发现，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搭建有意义的联系。

油田服务——安哥拉和尼日利亚

研究显示，积极的当地成分政策和强大的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为安哥拉的油田服务领域创造了一些良性联系。但是，这些联系主要存在于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制造厂，合资企业仍由国外跨国公司主导。

相比之下，尼日利亚的当地成分法律则在石油行业上游——勘探和钻井领域发挥了有效作用，同时，当地还希望提高下游行业，如炼油领域的附加值。当地原料供应商约占一半，越往供应链下游，当地供应商所占比重越大，所以纵深都形成了联系。此外，大型跨国石油公司采取了积极的供应商发展计划，但各计划的落实效率大相径庭。

钻石和木料——博茨瓦纳和加蓬

博茨瓦纳政府通过对钻石切割和抛光领域的投入，努力为钻石行业打通未来联系。这一举措相当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与矿业巨头 De Beers 公司的谈判，双方商讨续签 De Beers 在该国的特许权。

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加蓬木材行业的监管相对宽松，进入门槛较低，只要有链锯就行。如此一来，国内和国外企业大量开采森林，有些甚至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终端市场会影响联系的建立：欧洲买家会要求达到某种标准，而且偏爱半加工木材；而中国买家则喜欢未加工的原木。因此，出口市场转向中国后，联系的建立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金矿和铜矿开采——加纳、南非和赞比亚

加纳当地公司主要为二、三线供应商，而第一线供应商通常为跨国矿业服务公司及设备公司的子公司，尽管如此，加纳金矿行业的供应商一直在逐步发展。南非的采矿设备行业十分发达，在全球范围都颇具竞争力。鉴于该国深矿井内部环境复杂，因此选择就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而这一优势也促成了新产品的开发，这些新产品被销往国外。

我们看到，赞比亚的铜业也搭建起了合理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大型矿场收购了当地 60%-80% 的铜产量，尽管当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仍不完善，但是这些矿场已经与冶炼厂建立了前向联系。中国企业在赞比亚的铜矿行业也非常活跃，他们投资了三个矿场，包括位于 Chambishi 和 Chingola 的矿场以及一家冶炼厂，这表明，中非在资源领域有建立联系的条件。

理解研究发现

通过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影响联系建立的因素——如外包和全球供应商政策——是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固有属性，但也会受到大宗商品特性的影响。但是，其他因素更大程度上视环境和情况而定，因此政策创新对这些因素会有更深的影

所有权和公司来源国

一家公司来自于哪个国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公司的海外投资一般都会沿用他们所了解的最佳商业操作模式。中国企业与西方或非洲公司有所区别，有迹象表明，与中国企业建立联系的时

机已到。他们从中国进口更多劳动和资本设备，而不是将供应本地化，也没有和其他在当地建立服务业务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例如，西方矿业公司通常倾向于将大型机械设备（如挖掘机和卡车）外包给跨国公司，然后鼓励跨国公司在采矿作业场地附近设置办事处，从而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利益。相反，中国企业通常倾向横向一体化，更多投入或确保内部服务质量，而外包较少。

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来自股东或民间社会的压力较小，因而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也较少。“安哥拉模式”的融资是安哥拉和某些其他国家所独有的资源型贷款，在此模式下，中国国有企业 (SOEs) 与当地签订建筑施工合同，为当地带来劳动力和投入。这种方式具有高度的封闭性，与当地企业形成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均十分有限。通常，中国企业向潜在供应商提供的支持较少。

在加工方面，中国企业通常在中国进行提炼和加工，这也限制了与当地企业建立互动联系。中国消费者似乎较少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相关标准，导致加蓬的木材行业开始走下坡路。

然而，与中国国企 (SOEs) 大不相同的是，中国私营跨国公司 (TNCs) 更倾向市场化的供应关系。还有一种理解是，中国企业的这种运营模式反映出他们缺乏相关经验，因此可以期望，随着中国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信心越来越强，他们会逐渐学习中国以外跨国公司的做法。来自加纳的证据表明，中国国企开始学习西方企业的方式，逐步将劳动力本地化。

基础设施和技能

众所周知，影响联系建立的重要因素还与基础设施和技能有关。在非洲大陆，资源方面的基础设施为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非洲总体上非常贫穷，阻碍了资源的开发，有碍联系的建立。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Kuo, 2015），但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虽然各国技能水平各异，但技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国家设立了较好的培训项目，有些国家出现了技能流动的现象，安哥拉就是一个例子，曾经的中国国企员工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企业。

政策规划

所有例子都表明，在如何利用联系以及如何创造建立联系的机制方面，政策至关重要。我们调查的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目标，但掌握实现方法的国家则少之又少。政府需要制定路线图，先瞄准较低层次的目标，明确自身有哪些有待开发的潜力，并提供资源，而不是直接寻求建立遥不可及的联系。多方共同管理的模式、当地成分要求、技能发展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等，都至关重要。然而，私营跨国公司还需制定更好的“政策”，尤其是供应商发展和技能方面。

结论

非洲有潜力建立资源产业的产业联系，从而促进发展，但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取决于多个因素。有些因素是固有的，取决于跨国企业本身，例

如他们对质量、成本和交付效率以及外包数量的要求。情境因素与企业来源国有关，中国的跨国企业和中国以外的跨国企业存在显著差异。现阶段，中国的跨国企业不太愿意外包，所以潜在地减少了与当地建立联系的机会。

但这一点正在发生改变。随着最近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所有跨国企业都希望削减成本，而生产本地化就是削减成本的一种方式。有迹象表明，“东道主”国家的企业经营在技能禀赋和培训提供方面作出了积极改变，但非洲大部分地区仍缺乏这种改变。无独有偶，本地化和产业政策也出台，但效果有限——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政策的落实。

我们开展的 DFID-ESRC 项目“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和非洲石油生产商的经济增长”就旨在进一步完善上述观点和想法。该项目研究了中国石油公司近期在非洲加大投资的这一举措是否会以及如何给非洲带来包容性增长。石油行业呈高度国际化态势，且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石油行业给产油国带来的就业益处有限。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国际石油企业无异。中国企业尝试投资基础设施领域，为非洲提供长期贷款，未来可能会带来可观的净效应。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领先石油公司的企业战略，了解投资是否会给当地带来益处以及如何带来益处，所处的环境会对投资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实现这些益处可能需要哪些政策干预。

5. 中国制造业走进非洲：趋势、挑战和机遇

Deborah Brautigam,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摘要

中国对非洲制造业投资的不断增加会削弱当地企业的竞争力，但同时也会为它们带来机遇。就该问题展开的初步研究表明，新型投资商带来了更多协同工作方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加强结构转型。但目前缺乏中国在非活动的准确信息，从而难以评估外来投资是否真正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

引言

中国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生产已从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领域转移，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机遇。初步证据显示，中国制造类企业有意向在非洲投资。本文回顾了在建厂企业的类型、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中国企业投资的制造业类型以及投资可能为非洲的技术转移和技能发展带来的机遇。

加大制造业投资

从现有数据来看，制造业可能是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根据中国商务部 (MOFCOM) 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 (31%)、金融和银行业 (20%)、建筑 (16%) 以及制造业 (15%) (SCIO, 201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计划 (CARI) 对中国商务部批准的中国投资申请进行分析后发现，截至 2014 年底，中国政府批准的制造业项目中，128 个位于尼日利亚，80 个位于埃塞俄比亚，77 个位于南非，48 个位于坦桑尼亚，44 个位于加纳 (CARI, 2015)。

这些数据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大体上，像采矿或石油开采等大型资本密集型采掘活动中，非洲国家的学习机会较少。中国银行业唯一的重大投资项目，即中国工商银行在 2008 年收购了南非渣打银行 20% 的股份，部分原因是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学习机会。这样，在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两个领域的就业和培训方面就有望为非洲企业和工人创造学习和技术转移的机会。

重新审视“雁行理论”——新型投资商

1962 年，日本学者 Kaname Akamatsu 提出“雁行理论”，用以描述日本企业迁至海外的现象。成本上涨促使部分产业链更早地转向海外，而产业链的其他部分也在成本上涨后随之向海外转移 (Akamatsu, 1962)。例如，劳动密集型服装行业会先于资本密集型纺织行业迁至海外。最后外迁的则是机械设计和制造行业。东南亚和之后的中国成为日本企业的投资目的地。与日本合作后，技术发生了实质性转移，亚洲的许多其他国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这一类比虽然有借鉴之处，但根据我们对落户非洲的各类制造业企业的初步了解，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提出了“雁行理论”变式。

“寻求原材料的企业”

这类投资商在非洲建厂加工原材料，但之前，他们在非洲采购原料，运往中国进行加工。埃塞俄比亚的制革厂和皮鞋厂就是例子之一。中国有色金属公司在赞比亚的投资也是范例之一：该公司拥有矿石冶炼厂和选矿厂，不仅加工自己的矿石，还加工来自加拿大 First Quantum Minerals 公司和 Barrick Gold 公司的矿石。天利纺纱公司 (Tianli Spinning) 签订收购合同，从马达加斯加农民手中收购棉花，然后在毛里求斯的纺织厂加工。这些企业出口其大部分产品，而技术转移的机会则不尽相同。在一些国家，中国企业努力帮助供应商提升其技术。

“小型企业抱团共同发展”

这类投资商大部分是在去过非洲的朋友、商业伙伴或亲戚的推荐下来到非洲创业。他们试图在当地市场中占据小额利基市场，却发现自己涉足了之前在中国从未涉足的行业。这些企业通常是刚成立不久的小型家族企业，而且是由独立企业家们组建而成。他们往往会开展多元化的经营活动，而不是发展成制造业的顶尖合资企业。例如，在加纳的塑料产业聚集地，一批中国企业在那里回收塑料，然后将其制成廉价的塑料制品。我们还看到，加纳等地的非洲企业正在向中国学习一些相对简单的技术。

“大型企业寻求市场”

这类企业主要指建筑材料领域、汽车和交通工具制造以及大家电制造行业的企业入市模式。海尔和中国一汽在南非的工厂就是范例之一。同许多

企业一样，他们生产水泥等建筑材料，或回收钢材生产钢筋。我们发现，汽车装配制造行业的技术转移机会较少，但建筑材料领域却提供了大量可学习的技术。

投资吸引力从何而来

中国制造企业选择落户非洲哪个区位？即将落户的制造企业似乎并没有投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级中排名较高的国家。例如，尼日利亚获批的中国制造业项目最多，但该国在 2015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却仅排在第 170 名。同样，埃塞俄比亚仅排在第 132 名。南非排名 43，较为靠前；坦桑尼亚仅排在第 131 名，而加纳排在第 70 名。这表明，中国投资商在制定商业决策时，考量的是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而不是该国在报告中的排名。

在这方面，他们与其他外国投资商大同小异。在该报告中，中国仅排在第 90 名。影响他们商业决策的因素可能是人口和市场规模。如果我们仅就人口规模排名，并将其作为反映当地市场规模大小的指标，则获批中国投资排名前五的非洲国家在人口上的排名分别是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第五名和第七名。这表明，对于许多即将落户非洲的中国制造商而言，当地市场规模可能更为重要。

缺乏可靠数据

然而，上述各方面所带来的机遇因缺乏中国在全球非投资规模的准确数据而有所流失。根据中国商务部 (2014) 官方数据，2014 年，中国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 1231 亿美元。其中仅 32 亿美元流向非洲，且自 2011 年来该数字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但媒体报道的数字却千差万别。例如，《金融时报》收集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非投资额同比下降84%（Klasa, 2015）。2015年6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2015年第一季度，对非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45.9%，这一数据与《金融时报》的数据一致（MOFCOM, 2015）。另一方面，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收集的数据显示，对非投资同比增涨360%（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5）。

因为缺乏中国投资趋势方面的准确信息，非洲政府难以妥善调配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投资宣传活动，也令中国政府难以协助非洲将其打造成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此外，以下观点可能会

引发一定的从众效应。有人认为中国投资在大幅缩减，这种观点会让投资商放弃来非进行新的投资；而也有人认为中国投资在急剧增加，这种观点则令希望分一杯羹的潜在投资商跃跃欲试。

结论

我们的研究尚处于早期，但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更准确的中国制造业投资方面的信息，帮助非洲低收入国家和政府更好地为有意落户非洲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大的激励和优惠。这也将有利于援助伙伴更好地与政府合作，共同建立“归巢”，让这些飞雁可以落脚，并在当地生根发展。此外，共同为技术转移和技能发展建立激励机制。

6. 中国企业和非洲就业动态

Carlos Oya & Terry McKinley,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摘要

随着中国在非投资日益增加，人们开始对非洲员工在中国企业的工作环境表示担忧，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受雇于中国企业会获益良多。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在非投资的全面了解，充分研究中国企业为非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挑战显得更加必要。

引言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发展进程。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等类似对话机制在引入和加强南南合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中非合作论坛在推动中非关系实现“双赢”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剥削论仍然不绝于耳。

而矛盾的焦点落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国企业，那里的工作环境备受人们关注。有人称，中国企业雇佣的大部分是中国农民工，而非非洲当地居民 (Flynn, 2013)，有时甚至雇佣中国监狱劳工 (Chellaney, 2010; Hairong & Sautman, 2012)。据说，中国企业的工作环境不如当地国有企业或其他外资企业，尤其是在工资水平、卫生和安全以及加班福利方面，剥削情况严重 (参见人权观察 (例如), 2011; 或 Baah & Jauch, 2009)。

但此类推测几乎没有任何有力的数据支撑。此外，他们通常忽略了在中国企业就业以及与中国开展更广泛合作的好处。尽管目前关于中国企业在非投资规模和影响程度的信息有限，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参与会带来更多就业方面的机遇，当然也会带来挑战。

全球化和就业动态

与其他地区的一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国投资商和承包商也深受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影响。尤其是价值链的全球化，它将对就业环境造成深远影响：使得企业不得不对下游劳动力成本施加持续压力，以获取剩余价值。非洲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尽可能确保中国投资及其他外国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当地发展为导向。

当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国投资商和承包商有能力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投资是扩大当地工人就业面、提升就业水平的有力杠杆，从而逐步推动建立新兴工业劳动力的进程。中国企业一般从事大多数非洲国家欠发达的行业和经营活动领域，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水坝、桥梁和铁路系统）和制造业投资。这些方面的合作能提升工人的相关技能，而这些技能通常只有通过在职培训才能获得。

经济衰退——挑战与机遇并存

全球经济波动给非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可能性越来越大，投资“金融化”愈演愈烈，这些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外国投资造成重大影响。

一方面，原有的民间投资和公共投资有可能大幅削减（Patrick，2016）。公共投资的大幅减少可能会对安哥拉等国的公共工程和外国承包商造成重大影响，因而这些国家有可能在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另一方面，中国等国家在低端制造技术和建筑材料方面的产能过剩，从而导致上述行业在更低生产成本区域的本地化步伐加快，诸如非洲的一些区域（林毅夫，2012）。

同时，随着时间推移，金融的不稳定性会使这些进程的未来扑朔迷离。最近大宗商品（尤其是原油）价格急剧下降，在依赖大宗商品出口

的非洲国家，已经引发了对增速放缓的担忧（Rowden，2015）。然而，上述发展趋势反而有助于加快和拓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从而减少大宗商品市场的压力。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安哥拉已经出现了类似情况，而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当前，安哥拉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并已开始公开表达，需要实现多样化，促进制造业发展（Ovadia，2016），并不断强调要提升建筑材料制造、农产品加工及农业生产方面的发展（MIND，2014）。外汇短缺逐渐迫使企业采购本地产品，放弃进口，这一点在建筑材料领域尤为突出（Winsor，2016）。

埃塞俄比亚大胆的产业政策、中国及其他地方急需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到成本更低的国家以及市场机遇的增多使埃塞俄比亚有了新的

投资新引力（Oqubay，2015）。中国和土耳其企业率先在该国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点发展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领域（Hamlin 等，2014；Rowden，2015）。

了解就业动态

对于在中国企业工作的非洲工人，目前仅了解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可能优势。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充分了解中国在非企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为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研究员开展了一个旨在详细评估中国企业对非洲大陆就业方面带来的主要影响的研究项目。

该项目主要集中在两大增长迅猛的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研究团队计划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进行企业层面和工人层面的调查。在这两个国家，中国投资商和承包商均有大型投资业务。

主要分析的问题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两个行业所雇佣的非洲工人占总人数的比例；这一比例与其他企业的比较结果；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这一劳动力构成的根本原因。项目还将对比分析中国企业、他国外资企业与非洲国有企业的工人工资和工作环境，并将所获数据与中国当地的相关企业进行比较。

项目还计划对一部分先在中国企业工作、而后跳槽到国内其他企业的非洲工人进行专项调查。专项调查的目标是评估这些工人在中国企业工作期间是否获益于技能发展、技能培训，或从工作中学到了宝贵经验，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今后的就业前景。

研究结果将为非洲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政府希望将外国投资的积极影响发挥到最大，尤其希望扩大生产性就业。

7. 中国与南非在金融服务行业携手合作

Stephen Gelb, 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 英国)

摘要

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峰会上, 提出了促进中非金融机构之间合作的这一目标。本文表示, 中国与南非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已成功开展合作, 各国的金融服务行业各有特色、优势互补, 这也是合作的基础。

引言

于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 FOCAC 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审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MOFA, 2015)。该计划敦促中非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参见计划第 3.9.4 条)。事实上, 中非(主要是位于非洲大陆的南非以及其他地区)银行业之间早已开展了密切合作。

金融机构合作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 中国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ICBC) 于 2007 年以 5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非洲最大银行渣打银行 20% 的股份。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单笔对外投资。而且, 回顾中国在南非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中国与南非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项目至少有五次, 这只是其中之一 (Gelb, 2010; 2014)。¹

当时, 中国四大银行均在南非设有分行, 而南非四大银行中有三家在中国设有分行, 南非的两大保险公司也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更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与南非的独立机构关系密切, 彼此结盟。由中国建设银行、第一兰德银行和中国银行、EcoBank (非洲跨国银行, 总部位于多哥) 以及来自南非的莱利银行组成的三大银行联盟均将目光瞄准非洲市场。在保险市场领域, 中非结成

了两大联盟: 平安保险 (中国第二大人寿保险公司) 与南非的 Discovery Health 以及南非保险巨头 Old Mutual 与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²

各有特色、优势互补

为何外国金融机构能在当地获得较大市场份额? 为何金融机构之间能结成众多合作联盟? 原因不在于政策举措, 而在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战略。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要依托不同国家金融服务领域的迥异历史背景。各国都有自己的“优势”金融领域, 而优势——亦即各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各有特色但又彼此互补。

南非

外国投资南非银行业的历史悠久, 可追溯至 200 年前。19 世纪晚期, 矿业的兴起与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息息相关。对于企业和项目类的复杂金融产品, 只有具备强大信贷风险管理能力的银行才能经营, 长期以来, 这种能力也成为了南非银行业的能力核心。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 (白人) 中产阶级规模的持续扩大催生了零售金融服务市场的兴起, 产品创新和成本削减成为银行、保险和消费信贷市场的

关键，全行业由少数几家互相竞争、寻求优势的机构和企业所垄断。因此，南非的金融机构练就了多种能力和本领，但南非的市场规模较小，限制了资本基础，所以这些机构必须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建立全球网络。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他们一直遵循三大国际化战略。有些机构在其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把目标放在南非本地企业客户的维护上，称之为维护本地市场。还有一些机构则采用传统的市场开拓方法，寻求新消费者，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市场。第三类同样也是开拓新市场，但他们的目标是工业化国家。

中国

中国的金融行业则迥然不同，主要特点是规模大，企业和零售银行业务的国内市场较小，金融机构由国家支持（或者说是控制）

（Naughton, 2007）。四大国有银行历史不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央统筹规划的“独家银行”瓦解后才成立，目前有三家在非洲设有分行，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所以银行的资本基础非常雄厚，但产品范围却相对狭窄。加上对借贷人的软预算约束，整体上限制了金融行业能力和技术（如风险和信贷分析能力）的发展。

中国的银行对待国际化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2006 年，仅有 2% 的收入来自国外投资活动（Gelb, 2010）。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了大规模的银行改革和资本重组，四大银行中的两家开始在非洲开办业务。南非是中国各大银行进驻的第一批外国市场。

当时，中非双边贸易投资按价值计算还相当小。所以，这种做法不属于市场开拓或市场维持战略。中国银行进驻的唯一合理理由是寻求战略资

产，或称为“逆向外溢效应”行为。南非金融行业规模虽小，但十分成熟和“西化”，是中国各大银行了解国际化的最佳“课堂”。

南南合作

通常，金融服务的国际化首先需要金融机构在外国市场参与商业活动。如果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必备能力，将面临困境和巨大风险，这也是“南部”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和南非双方优势互补，彼此结盟有助于双方开拓业务，进驻第三方国家。“南南”合作的另一个好处是，伙伴之间通过合作，能对被开发市场的运营环境和风险评估方面的挑战有所了解。因此，“南南”合作在“南部”国家拓展国内市场的新领域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优势，中国的平安银行进军人寿保险业务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中国有意选择“南部”伙伴进行联盟。中国工商银行收购渣打银行 20% 股份时，时任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表示，收购部分股份可帮助实现工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私人股本和保险业务方面的目标，因为渣打银行一半的利润来自上述领域的经营活动（Russell, MacNamara

和 Anderlini, 2007）。无独有偶，平安公司与南非大型商业保险公司 Discovery 结成联盟，此前，平安曾考虑与美国保险公司合作，但最终放弃。Discovery 向中国合作伙伴提供技术和能力，双方合作模式类似于中国许多制造行业的发展套路，即以合资企业的形式与外国公司合作。通过合作，Discovery 获得进入巨大市场的机会。如果单枪匹马，Discovery 没有这个实力。

结论

除了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金融服务行业的结盟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引导。中非结盟合作表明，中非企业各有优势，但优势有限，中非均不具备开拓新市场的全部必备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互补领域拥有合作的潜力。

双方企业可以在优势互补领域携手合作，互利共赢。在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这类能为合作企业提供核心技术输入、为人民带来实惠的行业，双方合作能给位于产业下游的用户带来可观收益。因此，《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中敦促建立合作、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提议备受欢迎。

拓展多领域合作：贸易往来和环境保护

JBDODANEFLICKR

8 开展中非环境保护和海上贸易互利合作

吴御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9 了解中非自然资源贸易中的非正规性

翁晓雪，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 (IIED)

10 从依赖采掘行业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演变

Ross Harvey，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11 无人问津？中非关系发展背后的环境隐患

Roger Calow，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英国)

8. 开展中非环境保护和海上贸易互利合作

吴御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摘要

中国经济不断变革，对其贸易伙伴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非洲。中国的制造业转移使得资源需求下降，这对资源丰富的非洲经济体产生了负面影响。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峰会上提出，中非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海上贸易方面迎来了新的合作机遇。

引言

FOCAC 第二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在南非举行。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中国正试图摆脱由资源驱动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转而向服务业和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Wildau, 2015; Aberdeen Asian Equities, 2015)。

虽然这种转变带来的是全球性影响，但非洲受到的影响尤为深刻。人们越来越担忧，许多非洲经济体都要依靠大宗商品的出口，而中国这一非洲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会带来何种影响 (Mbele, 2015; Alfred, 2015)。

2015 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商品价格下跌，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商品数量比去年下降了 38% (Mail & Guardian Africa, 2015)。

但是，这些变化也让人们开始关注自然资源贸易以外的其他潜在合作领域。近期举行的 FOCAC 峰会上审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到了中非双方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如海上贸易 (参见计划第 3 条) 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参见计划第 4 条) (MOFA, 2015)。

建立“海洋经济”：海上贸易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主要基于历史上丝绸之路贸易通道，旨在建立一个多国共荣经济区。倡议还提到，要建立一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中国海、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 (国家发改委, 2015)。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已承建东非主要交通基础设施：承建了连接肯尼亚蒙巴萨和内罗毕之间的铁路，以及位于坦桑尼亚巴加莫约镇的港口。如果海上通道与陆路连通，那么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可通往中国，也可通往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

东非并非唯一受益于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非洲地区。2015 年初，中国与非盟签署了一项协议，中方将帮助非洲连通 (铁路、航空、公路) 非洲几大首都城市。这预示着，蒙巴萨-内罗毕铁路线等项目可能成为连接卢旺达、布隆迪和南苏丹等邻近内陆国家经济体的强大推动力 (Tiezzi, 2015)。

当然，要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克服一定的挑战。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它与非洲大陆

建设目标的互补程度，如《2050年非洲海洋综合战略》（非洲联盟，2012），该战略旨在解决非洲联盟成员国共同面临的海洋挑战和机遇。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还要考虑各国海洋战略中提到的种种议题，如南非2014年7月制定的“Phakisa行动”。虽然挑战重重，但中国努力与非洲国家建立海洋经济的这一举动表明，自然资源贸易转型之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野生动植物保护合作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中还提到，双方承诺加强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在内的环境合作。高层领导人意识到，野生动植物保护是中非关系发展和深化的重要体现。双方意识到清理整顿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是当务之急，由此看出，两国之间合作的本质已发生变化。2015年末，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双边讨论时提出，逐步禁止中美境内的象牙贸易。正是基于此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才使双方明白解决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问题的必要性（Schweig, 2015）。

高层领导人意识到问题后能否切实改变现状，这才是关键所在。要整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需要了解各相关人等、供求背后复杂的利益驱动以及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

此外，野生动植物交易已超出中非关系的范围，是非洲自身面临的更大、更长期问题的一部分。尤为严重的是，非洲国家（及社会）似乎普遍缺乏对野生动植物内在价值的认识（Wu, 2015）。单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落在了中产阶级身上。因此，野生动植物保护还面临着以下问题：

- **地方社区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 **野生动植物保护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有哪些体现**

例如，需要健全相关基础设施，宣传推广国家公园，维持国内和区域的政治稳定，从而确保野生动植物保护能够给国家财政带来贡献。

- **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

非洲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日程与其发展日程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如何激励社会重视生物多样性，让社会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不仅能创造利益，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这一点至关重要。

结论

文中所举的例子和FOCAC峰会上讨论的其他例子表明，尽管当前仍然面临经济挑战，中非合作拥有实现双赢的机遇。

随着时间推移，高层关系呈现多元化态势，双方开始探讨海上贸易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全新问题。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是否也会随之变化仍有待观察。尽管高层关系已有进展，但两国社会层面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希望FOCAC在解决各种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能够促进两国在正式和非正式领域之间有更多往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非关系向经济和高层政治合作以外的领域拓展。

另外一个问题是，非洲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与非洲的其他外交关系相适应。非洲的合作关系日益增多，这要求非方管理统筹多个合作关系，同时确保落实跟进机制来监督进展。FOCAC就是非洲国家参与的众多合作进程之一。理想情况下，非洲合作伙伴应将该论坛作为搭建更广泛合作的战略的一部分，不仅仅要把握与中国合作的机遇，还要寻求和考虑与他国合作的可能。

9. 了解中非自然资源贸易中的非正规性

翁晓雪，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 (IIED)

摘要

中国大额投资的影响和中非双边正式贸易往来已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相比之下，非正规领域，即中非小型贸易商和生产商的往来，却鲜有人关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依赖非正规经济活动谋生，因此中国在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帮助非洲人民脱离贫困时，必须考虑非正规经济体的作用。本文参考了喀麦隆地区的案例研究，对中非在自然资源行业的非正规贸易往来可能带来的益处进行了分析。

引言

中国现在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的 15 年里，中非贸易额从 100 亿美元上升到 2000 亿美元 (Blas, 2014)。当前，人们认为中非贸易对非洲发展的贡献集中在中国对非洲工业化、技术转移和制造业三方面的影响。虽然这些领域对非洲大陆的长期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众多政策讨论却忽略了一个要点：非洲巨大的非正规经济市场以及中国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与非洲的合作。成千上万的贫困家庭依靠非正规经济活动谋生，中国在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帮助非洲人民脱离贫困时，必须考虑非正规经济的作用。

了解非洲的非正规经济

对于非正规经济，并没有统一定义。广泛来说，任何“不受政府监督、无需纳税、无人监管的经济活动或收入来源”都可以称之为非正规经济 (Schneider, 2002)。不论如何定义，非洲的非正规经济规模巨大而又复杂。

研究表明，尤其在非洲农村地区，自然资源采掘和生产等非正规经济活动每天都在发生。

(Weng, 2015; Spiegel, 2012; Vorley 等, 2012)。复杂的治理问题，如土地和资源使用权的不明晰，以及过高的监管壁垒阻碍了小企业进入正规经济市场。因此，农村人口，如农民、伐木工人和矿工，必须在正规经济市场以外寻求赚取现金收入的机会，补给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非正规经济让他们得以维持生计，同时生产出大量可媲美正规经济产品的物资（关于木材，参见 Lescuyer & Cerutti, 2013；关于采矿，参见世界银行, 2008；关于农业，参见 Livingston 等, 2011）。

通常，非正规市场是穷人参与经济生产的唯一途径，其中大部分为妇女和年轻人 (ILO, 2009)。无论是非洲还是外国的投机商人，也能从这里发家致富。逃避法律监管的现象比比皆是，报酬过低的地方官员受贿现象也屡见不鲜 (Benson 等, 2014)。

非正规经济领域还有可能演变为农村地区反抗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意志的战场。在许多非洲国家，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经常成为农村和政府之间激烈冲突的根源，前者往往质疑后者制定的政

策和制度的合法性 (Perry 等, 2007)。在这种背景下, 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贫困, 更是农村对抗政府干预的一种形式。

非正规经济问题相当复杂, 因而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非洲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Chen, 2005)。

中国涉足非正规经济领域

中国适合涉足哪些非正规经济活动? 迄今为止, 中非研究一直集中在大型项目及中国国有企业这类大企业上。但是, 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家和移民在非洲从事小规模贸易和投资活动。尽管对该地区的研究相对缺乏, 但我们了解到, 非正规经济活动对地方社区有着直接影响, 特别是对管理自然资源的农村社区影响显著。农民、伐木工人和矿工可能成为中国贸易商和投资商的供应商、劳动力、中间商和业务伙伴 (Weng 等, 2014)。如此一来, 中国企业与农村的非正规资源和土地经济形成紧密联系。

中国在非洲自然资源方面的非正规小型贸易及投资往往被西方媒体描绘成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做法 (英国《卫报》, 2015; Hirsch, 2013)。非洲以及国际决策者和实践者提倡更严格的执法, 以规范这类贸易活动。同时, 宣称中国及当地涉足非正规经济活动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Chambwera 等, 2011; Weng, 2015)。单靠法律途径无法厘清非正规经济活动、法律执行与农村人口的生存挑战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 其结果可能利大于弊。

喀麦隆的非正规伐木活动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IFOR) 对喀麦隆的非洲紫檀木非法砍伐活动进行了研究, 其结果证明了上述观点。非洲紫檀木通常用于制作豪华家具, 在中国木材市场上叫价很高。因此, 它似乎是中国小型企业非法开采的理想选择。这些中国企业对资源如饥似渴, 尤其喜欢和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农村人口打交道。

在 2013 年夏天采访的 60 多位获益人中, 有 33 位直接参与非法伐木并与中国企业有直接业务往来——他们提到, 依赖森林为生的农村群体通过与中国买家交易, 从非法贸易中获得了现金收入 (Weng 等, 2014)。这与之前在喀麦隆 (Cerutti 等, 2011) 和刚果盆地所做研究的结果一致。有研究显示, 尽管价值链上的利润分配不公平, 但小规模的非正规伐木活动为地方经济带来的收入高达地区林业税收的 4 倍 (Wit & van Dam, 2010)。

经过实地调查, 我们了解到, 政府决定部分限制非洲紫檀木的出口, 这一举措迫使非正规小型伐木企业纷纷退出该行业。同时, 政府批准了大型工业特许经营, 以继续伐木活动。农村受访者反复表示, 该政策一经实施, 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影响。有些伐木工人还进一步表示, 参与非法贸易是他们抵制不公平体制的一个机会。同时, 了解该树种保护现状的决策者和学者承认, 政府颁布的这一禁令并没有改善濒临树种——非洲紫檀木的保护现状。

结论

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活动虽然无法长期可持续地解决贫困问题，但也不应忽视其带来的短期益处。讨论这一问题并不等于认同中国或地方企业的违法活动，只是认识到事实的存在。非正规经济关系到农村人口的生计问题，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规划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中国相关的经济活动时——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否则，就是冒险将非正规经济活动参与者作经济边缘化的处理。

研究还强调，需对非洲的非正规活动及其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以及中国参与者在活动中扮演的具体角色进行更多可靠的实地考察研究。研究人员应走进市场、森林及矿场，与企业及社区沟通，了解中国和地方参与者扮演的角色、他们之

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合作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核心问题包括：非正规贸易和投资是否为农村人口带来了可观收入？村民是否也参与反对所谓的政府非法土地占有？地方企业及中间商是否促成了非正规经济中价值链的形成？中国参与者是否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了独特影响？

本研究作为中非非正规资源贸易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获得了来自 DEGRP 和 IIED 研究人员以及来自 CIFOR、Indaba 农业研究所 (IAPRI)、农业经济学 (Agricultural Economics)、政策研究与信息中心 (APERIC) 等的科学家的支持。未来几年，将通过系统性研究了解非正规经济活动价值链，深度挖掘分析上述问题。未来三年，我们计划考察中非在木材、矿业和农产品领域的非正规小型贸易和/或考察非洲东部和东南部上述领域的相关贸易信息。

olivier girard/cifor

10. 从依赖采掘行业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演变

Ross Harvey,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摘要

全球经济放缓以及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尤其是中国，对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然而，对其他类型商品需求的上升为那些愿意共同合作、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的非洲国家创造了全新机遇。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新的机遇能否与保护非洲生物多样性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相平衡，仍有待观察。

引言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持续停滞，表明未来许多商品的需求量十分有限。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COP21) 在巴黎举行，会议协议提到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这说明，化石燃料商机已不复存在。煤炭和石油燃料的需求不太可能上涨。经济体的不断变化，如中国的经济变革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促使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服务业转型。于是，更加重了原本已下降的商品需求。

随着市场波动触底，整个自然资源行业将出现企业破产和越来越多的兼并与收购。世界三大矿业公司，Anglo America、BHP Billiton 和 Rio Tinto 股价大跌，折旧后净值大幅萎缩。这也会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经济体的供应商产生影响。所有非洲国家应当密切关注此问题，并相应调整自己的价格预期。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宗商品贸易的终结。对中国近期的经济改革分析表明，尽管石油和铁矿石等资源的需求下降，但新的需求会取而代之，从而带来全新的机遇。在中国，国内消费增

加，政府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这意味着，对食品 and 高技术产品的原料物资需求将增加。如果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适当出击，他们将在这类原料物资的供应方面得占鳌头。

不断变革的中国经济

2011 年，中国提出十二五计划。政府部门表示，中国将在 2020 年完成工业化阶段，实现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经济向服务和消费业的转型过渡 (Roach, 2011)。

目前，十二五计划中的许多过渡目标已提前实现 (Roach, 2016)。2015 年，服务业增长了 8.3%，而制造业和建筑业累计增长了 6% (Roach, 2016)。服务业每单位产量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多出 30% 以上的岗位需求 (Roach, 2014)，这意味着，虽然平均增速放缓，但城镇就业机会将持续增长，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储蓄水平和消费水平。2015 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达 1100 万，超过了政府 1000 万的目标 (Roach, 2016)。因此，最近宣布的 2016-2020 年十三五计划本质上是上个五年计划的延续。

对非洲的影响

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与中国（及大部分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以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为主。中国经济改革会使非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尽管许多非洲国家在大宗商品之外的其他领域实现了快速增长，但起点较低，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与大宗商品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作为矿业的互补行业，建筑、金融、零售服务往往在最开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却过于依赖矿业（McKinsey & Company, 2010）。

大宗商品泡沫破裂让许多分析家质疑，“非洲崛起”论调是否为时过早（McGroarty & Parkinson, 2016）。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依然薄弱，加上持续集中利用大宗商品实现增长，因此过分依赖采掘行业。

如上所述，尽管平均增速放缓，但中国的消费人口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势头。这表明，事实上，非洲有可能以全新的方式保持中非之间有价值的贸易往来。

非洲内部合作

如果非洲找准自身定位，可充分利用低廉石油和商品价格的“新常态”。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高科技产品；因此，对铜和铂这类高科技产品原料矿物需求也会增加。铜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重要成分，从太阳能技术到智能手机的生产都离不开它。随着燃料电池技术的广泛运用，铂会越来越多地运用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此同时，由于地缘政治存在不确定性，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央行以及世界各主要大国大举购入被视为安全资产的黄金。

要充分利用这些新趋势，非洲国家必须采取理性有效的区域策略。非洲国家需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互补互利，而不是恶性竞争，以低价出口大量大宗商品。赞比亚铜资源丰富，南非拥有技术专长。这两个国家可开展合作，制造出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真正需要的产品。同样，南非拥有世界上 75% 的铂资源。如果策略得当，南非有可能成为燃料电池的全球制造中心。这并不是说，直接发展冶金下游产业的附加值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和专业化依赖于平行和后向联系。然而，问题是，如果每个非洲国家只顾自身的发展诉求，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贸易条件可能仍不容乐观。

计算采掘成本

鉴于上述产业转向动态，非洲国家还必须确定，当采掘行业增长产生的机会成本未正确估价时，哪些行业最有发展价值。未来和现有资源一般靠近或位于野外，非洲国家必须考虑周全，不被新机会带来的可观前景蒙蔽双眼而无视其对环境的影响。

这并非易事。目前，资源、土地和生态系统等支持经济活动和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本（OECD，2005）在国际会计体系中的估价并不合理。如果允许以侵害或破坏珍贵的生物多样性为代价来发展矿业，则当前计算其产生的机会成本的最佳方法是计算流失的潜在旅游收入。

但旅游收入并不是衡量机会成本的理想基准：非洲国家青年人口膨胀，如果非洲国家想要通过创造大量就业来吸纳这些人口的话，旅游业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在采掘行业，采矿项目越来越多地进驻生态敏感区。但是，短期的地租回报与政府的环保动机相比，后者明显处于弱势。即使人们理解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仍依然如故。

此外，全球对食物的需求不断增加，如果食品生产本土化的新技术未得到广泛运用，则非洲的荒原区面临被用于农业生产的可能。不仅农业和采掘行业的扩张会威胁荒原地区的生态完整，而且提供食物、矿产及碳氢化合物运输的基础设施项目也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新的威胁。

结论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并非意味着大宗商品经济的终结，但未来矿产出口在经济中的构成势必发生变化。铁矿石和煤炭等资源出口很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继续下降，但对铜和铂等矿物的需求很可能会增加。对非洲国家而言，只要他们加强合作，就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非洲政府需要确保采掘行业和农业的发展不威胁到非洲的生物多样性，这是非洲未来赖以依存的基础。如果矿产和碳氢化合物开采场设在保护区附近，政府需要切实重视自然资本的价值，避免以牺牲生态旅游等行业为代价。

11. 无人问津？中非关系发展背后的环境隐患

Roger Calow, 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 英国)

摘要

随着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非洲，产品制造给环境造成的负担也随之产生。本文重点关注提供贸易产品和服务背后隐藏的水资源消耗，并就非洲能否避免水资源恶化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展开分析和思考。至今，中国一直在为水资源污染买单。

引言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这已经司空见惯。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 2014 年就已超过美国（世界银行，2016）。高增长率来自于国家将大量存款投入大型投资项目，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近期制造业的繁荣发展促成了这些投资项目的落地。然而，经济飞速增长背后是高昂的环境代价。1978 年，中国开始进行市场改革，8 亿人因此摆脱贫困。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受到广泛认可（世界银行，2016b），但中国国内对环境恶化的普遍不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更加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Shambaugh, 2013; Doczi 等，2014）。随着中国加强环境监管力度，产业向价值链的上游迁移，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改变对中非贸易将产生何种影响？具体而言，贸易关系的变化会对非洲的环境带来何种影响？

中国的环境足迹

大多数对中国环境足迹的阐述集中在温室气体排放、土地侵占及中国私营和国有企业环境绩效方面的问题。鲜少提及贸易中“隐藏”的自然资源消耗，如水资源，会带来何种环境影响。但事实上，全球产品和服务贸易背后隐藏的自然资源消耗对环境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本文从中国贸易背后隐藏的水资源消耗和中国水足迹的变化这两个角度进行阐释。

隐藏的水资源消耗

水足迹是衡量生产一件产品和提供一项服务所消耗的水资源的指标（Water Footprint Network, 2002）。可用其来计算某一流程（如种植水稻）、某一件产品（如一条牛仔裤）和某一家跨国公司（通过其供应链和出口市场）的水资源消耗量。“足迹测量法”建立在虚拟水贸易概念（即产品和服务贸易背后隐藏的用水量）之上，它能够说明某一国家是水资源“进口国”还是“出口国”（Allan, 2011）。⁴

随着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长，对水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中国仅拥有世界上 10% 的农田和 6% 的淡水，却要养活世界上约 20% 的人口（Doczi 等，2014）。种植作物、喂养牲畜、生产能源和工业燃料都离不开水。越来越多的富裕人口要消耗更多的肉类和其他水密集型产品，因此，快速的城镇化和饮食习惯的改变提高了对水的需求（Allan，2011）。金砖经济体中的俄罗斯和巴西拥有大量水资源，所以他们能够大量增加粮食生产，但中国则不然。因此，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相关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Doczi 等，2014）。

中国政策制定者通过大力投资水资源保护加以应对，并低调地放宽了对食物自给自足的定义（同上）。后一举措在公众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允许国家向水资源充足的南美和北美进口更多的食物。因此，中国的虚拟水“进口”量飙升。1986

年，净进口量约为 7 立方千米。到 2009 年，这一数字已超过 135 立方千米（Shi & Pinter，2014）。⁵

大部分虚拟水的进口来源于巴西、阿根廷和美国的大豆，这些大豆被用作动物饲料（Doczi 等，2014）。2014 年，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单一出口国（Brautigam，2015），如此，中国节省了原本种植作物需要的水量。而美国为了做到这一点，由美国纳税人承担高额的农业补贴买单。

与此同时，中非的食品贸易额很少。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农产品主要为棉花、橡胶、芝麻籽、烟草和可可豆，这些产品与从美洲进口的商品相比，数量微乎其微（Brautigam，2015）。此外，极少非洲国家至非洲大陆以外地区的出口呈现贸易顺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增长约为南亚的两

joe jungmann/flickr

倍，即使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危害，非洲大陆也已难保自给自足。从这一点看，非洲贸易现状并不令人意外。因此，非洲出口至中国的虚拟水也非常少，非洲亦无法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水缺乏问题。事实上，如果能从美洲获得廉价的食物和虚拟水，中国并不需要非洲的帮助。

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游迁移，非洲国家逐渐工业化，两国不同的环境足迹可能将彼此联系在一起。

非洲工业化的环境影响

中国在非洲的水足迹不会通过食物、贸易或不必要的土地侵占体现出来，而会体现在制造业中。

普遍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所以中国的制成品廉价而充足。但这并不完全正确。还有一个关键原因，中国的环境破坏成本没有计入产品价格（Watts，2010）。这一成本是巨大的。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要花费中国约 2-3% 的 GDP——这对一个 18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来说，是一笔庞大的数额（Doczi 等，2014）。所以，中国工业产品的虚拟水出口量远远大于其进口量。简而言之，出口以环境为代价。

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随着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向非洲，中国开始进口而非出口此类商品，因此环境压力将从中国转移到非洲。问题

是，非洲会从中国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进而采取措施来避免水资源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吗？

种种迹象表明，情况似乎并不太乐观。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对“硬件”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迟迟未兑现——如大坝、管网和阀门，用于水资源管理的“软件”水暖设施的投资也停滞不前。政府至今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同时，资助方急待量化结果。不像在水供应和卫生方面的投资，支持长期的水资源管理保护很难量化收益。结果导致许多国家的环境治理举措和制度薄弱，无法跟上日益增长的新水资源需求，无论是中国还是本土产业都如是（Calow & Mason，2014）。

结论

中非贸易关系背后隐藏着自然资源的流动。随着中非关系的变化，资源流动的模式和水平也会改变。中国已成为食品进口大国，自然也是食物种植耗水的进口大国。但无论是食品还是虚拟水，都将继续以从美洲进口为主，而非非洲。然而，随着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从中国迁至非洲，制造业的环境足迹也将向非洲转移。非洲政府需要加强环境治理，以保护水资源，避免水资源过度使用和污染。非洲政府应从中国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投资开展规范的水暖设施安装工作，而不是事后为错误买单，交高昂的“学费”。

治理、制度和外交

UN PHOTO/JC MCLIWANE

12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中国给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启示

宋丽娜，诺丁汉大学

13 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演变

Dan Large，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12.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中国给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启示

宋丽娜，诺丁汉大学

摘要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在推动 GDP 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地方服务的带头人。随着中非合作向贸易和投资领域之外不断延伸，非洲地方政府是否可向中国借鉴？本文列举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成功和失败案例，以及这些案例对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启示。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地方政府是改革当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之一。地方政府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鼓励开展提高地方就业水平的其他经济活动，有力地促进了 GDP 增长。地方政府还负责管理地方的福利分配，并监督干预措施的实施，以减少贫困（Lin & Liu, 2000; Zhang, 2006）。

中国近年来与非洲开展广泛合作（Brautigam, 2009），因此 DEGRP 发起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研究项目，旨在探究中国地方政府的举措是否能为非洲带来一定的启示。普遍上，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地方政府并未像中国地方政府那样发挥积极作用。非洲政府是否能从中借鉴一二？项目以肯尼亚和乌干达为研究对象，分析调查了中国的经验能否在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为这两国提供有用的启示和建议。

肯尼亚和乌干达：与中国的自然相似点

上个世纪末，一些非洲国家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经济“迷失期”后（Collier & Gunning, 1999），开始强劲增长（Radelet, 2010）。但整个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仍然处于严重赤贫状态，当地医疗和教育水平低下，制度和基础设施不完善，而这些是维持经济发展的必须条件（UNDP, 2012）。

乌干达和肯尼亚都经历过这些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两国具有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基于此提出了上述议题。乌干达和肯尼亚相邻，在气候、地理和历史方面都具有相似之处，这一点使得它们形成了天然的对照实验组，方便我们进行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评估。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具有一些相似点，因而特别适合充当中国地方政府举措迁移性研究的对象。

1986 年，乌干达内战终止，结束了国内的混乱局面，之后经济开始持续强势增长。2010 年，Radelet 将乌干达列入非洲新兴经济体之一。乌干达不是一党制国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全国抵抗运动组织执政后，形成了有力的地方政治体系（即抵抗委员会）。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实行地方分权制。因此，乌干达是研究地方管理的差异性及其影响的合适选择。

与此同时，人们称肯尼亚为“门槛经济体”（Radelet, 2010）。肯尼亚具备经济腾飞的条件，但自从 1978 年经历了长期经济停滞之后，

经济增长依然迟缓。继 1992 年开始多党民主制后，相比乌干达，肯尼亚的政治斗争更甚，而且社会不稳定性更大。肯尼亚目前正逐步实施权力下放。2010 年，宪法授权 47 个郡（之前为区）政府，让它们在包括医疗保健、学前教育和道路建设等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在此之前，这些范围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因为肯尼亚新近才进行权利下放，尚没有全面分析可循。所以，此次对肯尼亚地方治理的研究可谓十分及时。

中国地方政府的成功

由邓小平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顺利进行到了 21 世纪初，改革让地方政府获得了对经济项目的控制权。同时，改革也使得农村企业在 GDP 中的占比从 1978 年的 5% 增长至 2005 年的 28% (OECD, 2009)。在此期间，地方政府就如各自为政的微型国家，但又受制于强制性预算的约束，无法实施保护主义。而且，在为农村企业制定目标时，通常以利润为导向。

Xu (2011) 认为，中国是一个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国家，地区竞争和改革试验是解释中国呈指数级增长的“成就之谜”的关键。根据传统观点，中国的制度经济并不利于实现经济上的成功。中国给地方政府提供激励措施有利于经济发展，原因在于：第一，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的相对绩效直接挂钩；第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共享经济成果 (Zhang, 2013)。

更鲜为人知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和快速城镇化提高了上至各级政策、下至街道办等各级地方政府的灵活性和重要性。下级政府在实施政策、甚至启动干预机制时，有更大的灵活性。不同地方的资源、能力和利益都不同，有时甚至相

互冲突。因此，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必然形成竞争，彼此争夺投资或技术人才。

本土化对医疗和教育的影响

非洲地方政府普遍未发挥类似企业的经营作用。即便如此，虽然中国在经济和人类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并非所有的中国经验都适于效仿。中国的地方分权有利有弊，而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弊端尤为明显。这也是中非对比的有趣之处。

医疗权利下放

在改革之前，综合考虑国家收入的情况下，中国在医疗方面取得了出色表现。在改革的刺激下，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医疗方面的表现——如人均寿命——却进步迟缓，全国都表现平平。有证据表明，中国的财政权利下放加剧了医疗（和教育）投资无人问津的情况，进一步拉大了地区差异 (Zhang & Kanbur, 2005)。

有些解释提到，中国逐步转向以按服务项目收费 (fee-for-service) 为主的医疗服务支付模式，造成了质量下降、成本增加和医疗显失公平等问题 (Eggleston 等, 2008)。正是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2009 年另启改革方案。新医改目标是，到 2020 年提供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 (Meng & Tang, 2013)。

非洲最近的医疗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类似：早期表现较差，但伴随最近几年的经济复苏，情况得到显著改善 (UNECA, 2015)。贫困和政策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在金融危机期间，1987 年《巴马科倡议》提出后，医疗行业引入用户收费体系，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Ridde & Morestin, 2011)。在肯尼亚，Mwabu 等人

(1995) 发现，引入用户收费体系后，设施利用率降低了 50%，但收入的增加仅相当于医疗成本的 2%。2002 年，乌干达废除了基础医疗使用费，预计将惠及贫困人口 (Nabyonga 等，2005)，但私人医疗费用仍居高不下。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乌干达在引入行政和财政地方分权体制后，各地方卫生部分配给医疗行业的预算仅为“影子预算”的四分之一，并认为这一预算完全充足 (Jeppsson, 2001)。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医疗支出构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乌干达的地方分权导致了医疗支出下降，“公共物品”的特性凸显 (Atkin 等，2007)。中国亦如此，财政权利下放似乎会导致医疗投资的下降。

教育权利下放

提供基础教育是中国及大部分低收入非洲国家地方政府的责任。与医疗行业类似，20 世纪 80 年

代和 90 年代，非洲经济停滞，中非入学率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后，差距慢慢缩小 (UNESCO, 2014; Lewin 等，2011a, b)。部分原因是中央下令取消学费的计划起了作用。1997 年，乌干达首次推出实施这一计划，初等教育入学率由此增加了 50%。

然而，辍学问题仍然是摆在许多非洲国家面前的一道难题。据统计，乌干达仅有 32% 的学生完成初等教育 (UNESCO, 2012)。相比之下，中国已基本普及初等教育，但中等教育仍然存在不平等：例如，农村女孩仍是弱势群体 (Song 等，2006)。

教育带来的工资回报是影响入学率的原因之一：中国标准统计数据普遍较为平庸，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不断攀升 (Appleton 等，2005)，这一统计数字仍然较为保守 (Heckman, 2005)。在非

steve harris/世界银行

洲，通常认为教育回报较高，但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也在发生改变（Colclough 等，2010）。例如，1978 年到 1994 年期间，肯尼亚经济低迷，教育回报暴跌（Appleton 等，1999）。20 世纪 90 年代，乌干达经济复苏，教育回报也随之提高（Appleton，2001）。

人们日益重视教育质量，部分原因在于担心数量的增加是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文献和观点提到了认知能力对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尽管有些研究开创性地用到了微观数据，但人们日益关注教育的主要原因并非微观层面的研究，而是学生学习成绩对国民收入影响的宏观研究（Hanushek & Woessmann，2008；Atherton 等，2012）。

在中国，地方分权制度被认为是导致教育和医疗投资力度低以及地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Zhang & Kanbur，2005）。乌干达国家政府努力引导地方政府正确使用资金：公共支出跟踪调查发现，1991-1995 年间，中央给初等教育领域（工资支出除外）的拨款仅有 13% 落实到了学校手中（参见 Reinikka & Svensson，2004）。中央需要一致行动起来（主要是学校和纸媒领域按人发放津贴），大力提高教育投入。在肯尼亚，Kremer 等人(2003) 提供了有关教育权利下放影响的令人

警醒事例，认为教育权利下放会引发不正当的办学动机，人们会争相建立小型学校，雇用大量老师，并剥夺无法支付学费儿童的受教育权。

结论

中国的地方分权模式是否具有迁移性，仍存在一定疑问。虽然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国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比许多非洲国家拥有更高层次的中央集权，在政治和管理结构上拥有更为严格的分层。在这种制度下，既可以将更多的财政权利下放，又可以压制富裕地区企图独立的野心。民主国家和一党制国家在地方官员的激励措施方面可能大相径庭。中国失败的经验可以帮助规避错误。例如，中国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问题在最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非洲国家应从中获得警示，避免重蹈覆辙（Song，2012）。

尽管挑战重重，中国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举措还是能为非洲国家在加强经济复苏方面提供灵感来源。人们对地方分权褒贬不一。在地方服务和治理方面，中国与非洲之间以及某些国家的地方政府之间各有不同，这种差异为我们研究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提供了机会。这也正是 DEGRP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 项目实施的前提条件。通过该项目，我们将收集和分析中国、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地方政府的微观数据。

13. 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演变

Dan Large,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摘要

在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峰会上, 中国和非洲官员承诺加强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双方还表示, 要加强双边经济和文化联系, 和平是必然要求。本文审视了中国近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方面的角色变化, 分析了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事务会带来哪些挑战和益处。

引言

就在不久之前, 许多人还认为中国对于投资风险具有独特免疫力。中国在动荡的市场中参与投资活动, 这对其他投资方而言是禁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中国确实拥有与众不同的能力, 可以在国家动荡的情况下仍然投资获利 (Child & White, 2005)。1995 年起, 中国在饱经战乱的苏丹投资石油行业, 大获成功。尽管这些投资非常成功, 引人注目。但实际上, 中国投资与外部投资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风险。

例如, 苏丹和南苏丹之间以及南苏丹内部的冲突迫使中国关闭了其石油业务。再加上全球石油价格下滑, 中国的投资遭受了巨大影响 (Wu, 2014)。

2015 年 11 月下旬, 在位于马里的巴马科丽笙蓝标酒店 (Radisson Blu) 发生的一次袭击事件中, 中国铁路建设集团公司的三名中国高级员工被杀。事件发生不久后, 在就中国海外员工在非洲遭受大量袭击而发出的一片声讨声中, 中国外交部承诺打击极端主义, 加强与非洲的反恐合作 (Wee, 2015)。虽然袭击并非针对中国, 但中国

工人的死亡无疑会让人们开始担忧: 中国在该国的投资项目该如何继续。

同样, 津巴布韦政府最近决定接管 Marange 矿区的所有钻石矿。此举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威胁。人们担心, 两国之间的全天候友谊可能因此动摇, 与中国签订的经济协议也可能受到影响 (Kachembere & Majaka, 2016)。

促进和平与安全合作

因此, 2015 年 FOCAC 峰会加强促进和平与安全合作的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 (DIRCO, 2015; MOFA, 2015a)。

此举是解决和平与安全系列措施中最新举措。之前, 早在 2000 年第一届 FOCAC 时, 中国就强调了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 并表示安全问题主要受限于与各非洲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

此后, 中非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已从边缘逐步占据了政策框架中的主流位置。2012 年, 在“阿拉伯之春”和利比亚政权更迭的大背景下, FOCAC 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公开关注中国在非洲承受的经济风险, 由此建立了中非和平与安全

合作关系，以提供金融支持、能力构建和其他形式的制度支持。

中国在非洲安全领域的复杂角色

很明显，要保护中国参与方的安全，维持中国在非洲活动的稳定性，需加强措施。但是，中国目前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复杂，所以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如今，中国在非洲事务上发挥着更为重要、更加公开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扮演了政治色彩浓郁的角色。中国对中央政府怀有更多期待，希望中国在非洲不仅只发挥经济方面的作用。中国参与了非洲的各类安全问题，在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十分高调。舆论认为这是一种提升国际形象的手段，中国借此改善与东道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利益。

- 第二，中国参与和平建设活动，引发了关于中国、非洲和西方对这一活动内涵的理解以及各国反应之差异的讨论。

- 第三，中国参与和平与安全，这涉及到多个因素。随着中国在非洲和全球的角色演变，这种参与也在不断发展。中国的军事参与问题虽然是 FOCAC 进程的一部分，但双边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2015 年 12 月初，中国正式宣布签署吉布提军事物流基地租约，标志着中国打破参与非洲大陆军事合作的空白。

- 最后，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经过联合国正当流程，为支持合法维和，北京继续坚持不干涉原则。同时，在南苏丹等地，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其必须肩负责任，并且中国还要面对经济利益受到的威胁。因此，必须要协商界定不干涉和不作为之间的差别。

unmiss/flickr

中国与南苏丹合作持续推进

自 2011 年 7 月南苏丹独立后，中国就一直与南苏丹开展合作，虽然期间苦难重重，但也表明中国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这将大有裨益。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国被授权向南苏丹部署第一批作战部队，准备逐步加强外交政治干预，帮助南苏丹政府与主要反政府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 反对派）达成协议。

这标志着中国更深入地参与维和行动，也证明了一些中国分析家的观念，即南苏丹是中国新型“积极”外交的试验田（Shen, 2011）。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国有义务在南苏丹开展维和行动。中国与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的关系将影响到中国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也是在保护中国企业在南苏丹石油行业的利益。

虽然我们不应放大本案例的意义，但中国在南苏丹事务上的战略性回应以及在南苏丹的战略部署都可以预示中国未来一系列的举措：涉足未知的政治领域，应对安全威胁和风险变化，回应外界期待，承担更大责任，寻求解决声誉问题的办法，以及更加积极努力地支持冲突的解决。

结论

和平与安全现已在中非关系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但这些愿望能否在现有的非洲及全球和平与安全框架下转变成实际的操作，又该如何完成这一转变尚不明确。中国参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第 16 个目标（和平、正义和强有力的制度）面临着很多问题。中国政府调整中国不干预的外交政策原则与《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4 条）中规定的不漠视外交政策原则还面临着长期的紧张局势。中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中的规范性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落实 FOCAC 安全计划，仍值得人们关注。

在经济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安全问题可能令中非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FOCAC 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说，“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MOFA, 2015b），与中国一贯以来的官方观点相同，即发展是安全的最高表现形式（CFR, 2014）。但由于经济持续低迷，人们担心，发展举措也会受到影响（Harlan, 2016）。安全问题引发的挑战究竟会有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影响如何，很显然，非洲朝着更加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发展，这对各方而言都至关重要。

结论

摘要

中非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迅速发展。正如近期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峰会所证实的，随着中非之间合作的日益成熟，中非之间的合作重点已从最初的经济合作逐步向和平、安全、环境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合作。

DEGRP/SAIIA 会议上探讨了许多相关议题。与会各方就中非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专业见解，并提出了未来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加快推动非洲工业化

林毅夫和海宇的开幕致辞都强调了工业化在快速启动非洲经济和加强发展方面的作用。两人都分享了如何在中非关系的背景下以最佳方式实现工业化。

林毅夫引用了历史案例研究，表明产业发展的成功关键在于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政府支持工业化，能够敏锐地察觉并抓住机遇。对于非洲而言，这意味着要选择适当参照国，模仿他们的做法，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随着中国逐渐摆脱轻工制造业，非洲要随时准备好“接班”。

Hai 反思回顾了她在埃塞俄比亚建鞋厂的经验，让人们开始关注工业化给投资商和东道国带来的好处。Hai 认为，中国和非洲是绝佳的商业搭档。亚洲的制造业技术和非洲的比较优势构成了她称之为商业成功“合作三角”的两边，剩下一边是全球市场。

中非投资发展

由 Giles Mohan、Deborah Brautigam、Carlos Oya 和 Terry McKinley 及 Stephen Gelb 合著文章中，继续探讨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性质及其带来的潜在机遇。

Mohan 对非洲自然资源行业能否催生附加值活动进行了探究，并研究了影响附加值活动发展的多个因素。经论证，企业的国别和企业行为是尤为关键的因素，既可带来积极变化，也会阻碍积极变化的产生。例如，中国企业倾向于横向一体化（外包较少），因此其产生的影响有限。但是，事情并非一成不变，中国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越来越愿意参与当地经济。

Brautigam 更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在非投资商的本质。作者将“雁行模式”扩展成多个变式，来概括不同类型的非洲合作投资商，以及投资商可能带来的合作机遇。但是，她还指出，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在非投资的细节，从而了解推动结构转型所需的条件。因为缺乏精确数据，非洲政府可能面临资源浪费在错误投资领域的风险。同样，对现有投资情况的认识失实会阻碍投资商建立新的企业。

Oya & McKinley 以及 Ryder 也分别提到了中国在非活动的数据缺失的问题。前者提到，中国（及他国）在非投资不仅能够短期内促进就业，长期来看，还能够当地培养形成熟练的产业劳动力。但是，目前缺乏中国在非投资的详细信息——尤其是就业动态方面——因此，需要对

此进行进一步研究。Ryder 重点论述了双方高层之间达成的协议——如《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将如何促进数据收集工作。

换言之，积极、持续的合作已在某些领域展开。Gelb 指出，南非和中国企业在金融领域联系紧密，两国都从双边优势互补中获益。对中国而言，通过与南非的合作，可以了解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的风险和收益，获得相关的一手资料。

拓展多领域合作：贸易往来、非正规经济 and 环境保护

其他如环境、交通和非正规贸易等领域也为加强中非合作带来了机遇。吴在文章中重点介绍，中国承诺与非洲开展海上贸易，并共同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行动，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翁的文章引发了人们对非正规自然资源贸易重要性的关注。文章引用了喀麦隆非法伐木的案例研究，认为当地商人与中国买家之间的非正规交易是农村重要的生计来源，中非合作应将其纳入讨论范围。

然而，面对新机遇，我们必须衡量它会给环境带来的影响。Harvey 指出，对有意愿共同合作的非洲国家来说，商品低价的新常态对他们制造供应商品大有益处。而且这些国家必须保证生产制造不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破坏生物多样性。但是，由于自然资产的价值很难计算，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具有挑战。

与此类似，Calow 指出，中国可能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迁至非洲，所以资源消耗也会同步

迁移。制成品所需的虚拟资源——如其引用案例中的水资源——也会从一国向另一国迁移。为保护非洲水资源及其他资源不被过度消耗，非洲政府需要加强环境治理。

治理、制度、和平与安全

制度在中非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大小还有待观察。宋研究了中国政府在医疗教育权力下放方面的改革经验，以及中国的经验能否为有着相似分权结构的肯尼亚和乌干达地方政府提供一定帮助。尽管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能为非洲提供一些经验和参考，但这些经验是否真的具有迁移性仍未可知。

同样，Large 认为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在中非关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最近在南苏丹部署军事活动，另一个是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积极应对安全问题。文中概述了关注和平与安全将给各方带来的好处，同时强调了将面临的挑战。但最关键的是，高层决定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及如何实现这一转化。

非洲的角色

贯穿所有文章的核心是非洲在中非关系中的角色。中国在非洲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会带来许多机遇和挑战，但非洲国家作何回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非合作的未来。非洲国家要利用好中国带来的机遇，积极定义其在中非关系中的地位。如这些文章所述，过去已成定局，未来大有可为。

注释和参考文献

注释

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2010 年尼日利亚与中国银行之间的合作：两家尼日利亚银行——海洋银行和第一银行——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尼日利亚领先银行——非洲联合银行 (UBA) 与中非发展基金的主要赞助商国家开发银行 (CDB) 建立联盟关系。
2. 1999 年，英国普卫保险公司 (Old Mutual) 将总部迁至伦敦，但在 2015 年宣布重返南非。并且，通过瑞典子公司 Skandia 与 BSAM 合资。
3. Phakisa 是塞索托语里“迎头赶上”的意思。有关此计划的信息和文件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operationphakisa.gov.za/Pages/Home.aspx>
4. 日本、新加坡和约旦仅有少量可用地表和地下水，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保证了水资源和食品的安全。再比如，埃及 40% 的水资源需求都是靠虚拟水贸易（主要为食品进口）来满足。整个中东和北非都是依靠经济体系填补当地用水缺口，实现水资源（及食品）安全，而不是依靠水利工程体系。
5. 客观来看，中国大规模南水北调工程每年的最大供水能力达到约 45 立方千米。该工程旨在缓解北方水资源压力，花费超过 600 亿美元。

参考文献

引言

Abiad, A., Lee, M., Pundit, M. and Ramayandi, A. (2016) 'Moderating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Asia and Beyond'. ADB Brief no. 53.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Barton, D., Chen, Y. and Jin, A. (2013) 'Mapping China's middle class', *McKinsey Quarterly*. New York: McKinsey & Company.

Bohlund, M. and Orlik, T. (2015) 'China's road to Africa closes infrastructure gap, adds debt risk' in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Bloomberg Brief. New York: Bloomberg.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bloombergbriefs.com/content/uploads/sites/2/2015/07/SC_O62615-OBOR.pdf

Bremmer, I. (2015) 'These 5 Facts Explain the Global Impact of China's Impending Slowdown', *Time*. 8 月 28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time.com/4014687/these-5-facts-explain-the-global-impact-of-chinas-impending-slowdown/>

Carey, R. and Li, X. (2016) 'China'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ith Africa'. IDS policy briefing III.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Africa Blog (2012) 'Africa to become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by 2017', *The ChinaAfrica Blog*. 10 月 17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chinaafricablog.com/post/33789614152/africa-to-become-chinas-largest-trading-partner#.Vwpgz_l97IU

Gelb, S. (2014) 'South Afric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nks with the BRIC Countries'. WTI/Mandela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Bern: World Trad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Bern.

Hofman, B. (2015)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what we know thus far', *World Bank Blog*. 4 月 12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blogs.worldbank.org/eastasiapacific/china-one-belt-one-road-initiative-what-we-know-thus-far>

Huang, Y. (2013) 'China's great rebalancing: promise and peril'. *McKinsey Quarterly*. New York: McKinsey & Company.

IMF (2015) 'Country Repor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IMF Country Report No. 15/234.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cr/2015/cr15234.pdf>

Johnson, P. (2015) 'The "One Belt, One Road" Policy - History, Trends and Possibilities'. SARD/ICASSA Paper. Zimbabwe: 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

Lin, J. (2011) '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 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DER Annual Lecture 15. Helsinki: UNU-WIDER.

MOFA (2015), "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2016—2018)". 中非行动计划。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 6 部分。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23159.shtml

Namata, B. (2014) 'Chinese firm to set up textile plant in Rwanda', *The East African*. 7 月 19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theeastafrican.co.ke/business/Chinese-firm-to-set-up-textile-plant-in-Rwanda/-/2560/2389932/-/wipy7k/-/index.html>

Olander, E., van Staden, C., and Tiezzi, S. (2016) 'Africa's role i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Global Trade Strategy', *ChinaFile* podcast. 3 月 14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s://www.chinafile.com/library/africas-role-chinas-one-belt-one-road-global-trade-strategy>

Weng, X. and Buckley, L. (2016) 'Chinese businesses i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o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IIED Discussion Pape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文 3

MOFA (2015),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2016—2018)". 中非行动计划。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23159.shtml

UNDP (2015) 'If Africa builds nests, will the birds come? Comparative study o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and China'. UNDP Working Paper 06/201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文 4

Alfred, C. (2015) 'Why China's Economic Woes Are Causing Alarm in Africa', *Huffington Post*. 5 月 9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china-economic-problems-africa_55e76780e4b0c818f61a81ef

Brautigam, D. (2015) 'What does China's shock yuan devaluation mean for Africa?', *CNN*. 8 月 18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edition.cnn.com/2015/08/18/opinions/china-yuan-devaluation-africa-deborah-brautigam/index.html>

Elliott, L. and Inman, P. (2015) 'China syndrome: how the slowdown could spread to the BRICS and beyond', *The Guardian Online*. 8 月 22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5/aug/22/could-china-crisis-spread-to-emerging-markets>

England, A. (2015) 'African growth feels the strain from China's slowdown', *Financial Times*. 10 月 27 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ft.com/cms/s/2/ef4d851a-7bc5-11e5-98fb-5a6d4728f74e.html#axzz3qigC5BFJ>

Hruby, A. (2015) 'China's slowdown: an opportunity for Africa to address longstanding economic inefficiencies', *Financial Times*. 10月26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blogs.ft.com/beyond-brics/2015/10/26/chinas-slowdown-an-opportunity-for-africa-to-address-longstanding-economic-inefficiencies/>

Kuo, S. (2015)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 The African Perspective', *Forbes*. 7月8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orbes.com/sites/riskmap/2015/07/08/chinas-investment-in-africa-the-african-perspective/#3a3d5cd916e2>

Morris, M., Kaplinsky, R. and Kaplan, D. (2012)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Promoting Industrialisation by Making the Most of the Commodity Boom in Sub-Saharan Africa*. Manchester: Making the Most of Commodities Programme, Open University.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prism.uct.ac.za/Downloads/MMCP%20Book.pdf>

Nrabinde, S. (2015) 'China slowdown shouldn't be Africa's biggest concern', *The Citizen*. 11月5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citizen.co.za/854317/china-slowdown-shouldnt-be-africas-biggest-concern/>

Okeowo, A. (2013) 'China in Africa: the new imperialists?', *The New Yorker*. 6月12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china-in-africa-the-new-imperialists>

Wei, L. (2015) 'China's Central Bank Moves to Spur Economic Growth', *Wall Street Journal*. 10月23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s-central-bank-cuts-rates-1445601495>

文5

Akamatsu, K. (1962)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1):3-25.

CARI (2015) Analysis of Database of Chinese Approved Investments, 2000-2014.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Washington D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eloitte (2014) 'More experienced buyers, higher financial returns', 2014 Greater China outbound M&A spotlight report. Beijing: Deloitte China.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2.deloitte.com/cn/en/pages/finance/articles/2014-greater-china-outbound-ma-spotlight.html>

Deloitte (2015) 'China outbound momentum unabated despite economic uncertainty'. 2015 Greater China outbound M&A spotlight report. Beijing: Deloitte China.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2.deloitte.com/cn/en/pages/international-business-support/articles/2015-greater-china-outbound-ma-spotlight.html>

SCIO (2013), "中非经贸合作(2013)". 政府白皮书。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english.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4/08/23/content_281474982986536.htm

Klasa, A. (2015)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plunges 84%', *Financial Times*. 10月21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t.com/cms/s/3/10648918-773b-11e5-a95a-27d368e1dddf7.html#axzz45o08tQJl>

MOFCOM (2015), "2015年5月15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newsrelease/press/201505/20150500978894.shtml>

MOFCOM (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statistic/foreigninvestment/?>

文6

Baah, A.Y. and Jauch, H. (2009)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 a labour perspective*. Accra and Windhoek: African Labour Research Network.

Chellaney, B. (2010) 'China's newest export: convicts', *The Guardian*. 7月29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libertycentral/2010/jul/29/china-export-convict-labour>

Flynn, D. (2013) 'China brings goods and roads, now Africa wants jobs', *Reuters*. 7月21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africa-china-idUSL6NOFI3TE20130721>

Hairong, Y. and Sautman, B. (2012) 'Chasing Ghosts: Rumour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xport of Chinese Convict Labou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210:398-418.

Hamlin, K., Gridneff, I., and Davison, W. (2014) 'Ethiopia becomes China's China in Search for Cheap Labour', *Bloomberg*, 24 July.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7-22/ethiopia-becomes-china-s-china-in-search-for-cheap-labor>

Human Rights Watch (2011) "You'll Be Fired if You Refuse": Labor Abuses in Zambia's Chinese State-owned Copper Mines'. HRW Report.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s://www.hrw.org/news/2011/11/03/zambia-workers-detail-abuse-chinese-owned-mines>

Lin, J.Y. (2012) '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 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 Policy*, 3 (4):397-409.

MIND (2014) *Indústria*, Issue 2. Magazine of the Angolan Ministry of Industry. Luanda: Ministério da Indústria.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mind.gov.ao/VerPublicacao.aspx?id=1443>

Oqubay, A. (2015) *Made in Africa: Industrial Policy in Ethiop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vadia, J.S. (2016) *The Petro-Developmental State in Africa: Making Oil Work in Angola, Nigeria and the Gulf of Guinea*. London: C. Hurst and Co.

Patrick, M. (2016) 'Angola Cuts 2016 Spending by 20%',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月14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wsj.com/articles/angola-cuts-2016-spending-by-20-1457980425>

Rowden, R. (2005) 'Africa's Boom Is Over', *Foreign Policy*. 12月31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12/31/africas-boom-is-over/>

Winsor, M. (2016) 'Can Angola's New Steel Mill Save Its Economy? As Oil Prices Plunge, Luanda Looks to Diversif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1月29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ibtimes.com/can-angolas-new-steel-mill-save-its-economy-oil-prices-plunge-luanda-looks-diversify-2283990>

文7

Gelb, S. (2010) 'South Afric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nks with China'. Working Paper. Johannesburg: EDGE Institute for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Gelb, S. (2014) 'South Afric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nks with the BRIC Countries'. WTI/Mandela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Bern: World Trad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Bern.

MOFA (2015), "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 中非行动计划。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23159.shtml

Naughton, B.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Russell, A. MacNamara, W. and Anderlini, J. (2007) 'ICBC in \$5.6bn S Africa bank deal', *Financial Times*. 10月25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t.com/cms/s/0/cae37632-8324-11dc-b042-0000779fd2ac.html#axzz45tcZHQQG>

文8

Aberdeen Asian Equities Team (2015) 'Is China Headed for a Hard Landing?', *Market Realist*. 12月7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marketrealist.com/2015/12/china-headed-for-a-hard-landing/>

African Union (2013) '2050 Africa's Integrated Maritime Strategy (2050 AIM Strategy)'. African Union Strategy Paper. Ethiopia: African Union.

Alfred, C. (2015) 'Why China's Economic Woes Are Causing Alarm in Africa', *Huffington Post*. 9月25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china-economic-problems-africa-us_55e76780e4b0c818f61a81ef

Mail & Guardian Africa (2016) 'Ouch! China's imports from Africa shrank nearly 40% in 2015 - it could get really painful for these countries', *Mail & Guardian Africa*. 1月13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mgafrika.com/article/2016-01-13-chinas-imports-from-africa-plummet-in-2015-officials>

Mbele, L. (2015) 'Five ways China's economic crisis will affect Africa', *BBC*. 8月27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34060934>;

MOFA (2015), “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2016—2018)”。中非行动计划。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23159.shtml

NDRC (2015),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动计划。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en.ndrc.gov.cn/newsrelease/201503/t20150330_669367.html

Schweig, S.V.(2015) 'US and China ban ivory sales in historic move', *Africa Geographic*. 9月28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africageographic.com/blog/us-and-china-ban-ivory-sales-in-historic-move/>

Tiezzi, S. (2015)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Don't Forget Africa', *The Diplomat*. 1月29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chinas-maritime-silk-road-dont-forget-africa/>

Wildau, G. (2015) 'China services sector key to growth', *Financial Times*. 12月6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t.com/intl/cms/s/0/0f6f0018-9817-11e5-bdda-9f13f99fa654.html#axzz452Zx6bbj>;

Wu, Y. (2015) 'Not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Understanding China and South Africa's Illegal Wildlife Trade'. SAIIA Policy Insight.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文 9

Benson, E., Best, S., del Pozo-Vergnes, E., Garside, B., Mohammed, E.Y., Panhuysen, S., Piras, G., Vorley, B., Walyncski, A. and Wilson, E. (2014) 'Informal and green? The forgotten voice in the transition to a green economy'. IIED Discussion Pape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Blas, J. (2014) 'China's central bank chief admits difficulties with Africa', *Financial Times*. 5月22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t.com/cms/s/0/5b212302-etc9-11e3-b7c4-00144feabd0c.html#axzz45bZTHphh>

Cerutti, P.O., Lescuyer, G., and Yembe-Yembe, R.I.(2011) 'The domestic market for small-scale chainsaw milling in Cameroon: present situ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IFOR Pape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Chambwera, M., MacGregor, J. and Baker, A. (2011) 'The Informal Economy: A primer for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IED Pape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hen, M.A. (2005) 'Rethinking the informal economy: Linkages with the formal economy and the formal regulatory environment'. UNU-WIDER Research Paper 2005/OIO. Helsinki: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文 10

McGroarty, P. and Parkinson, J. (2016) 'Mining Collapse Cripples Africa's Dreams of Prosperity', *Wall Street Journal*. 3月4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wsj.com/articles/mining-collapse-cripples-africas-dreams-of-prosperity-1457104328>

McKinsey&Company (2010) 'Africa's path to growth.Sector by sector', *McKinsey&Company*. 6月。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mckinsey.com/global-themes/middle-east-and-africa/africas-path-to-growth-sector-by-sector>

OECD (2005) Glossary of Statistical Term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s://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ID=1730>

Roach, S.S.(2014) *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New Cana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ach, S.S.(2016) 'False Alarm on China', *Project Syndicate*. 1月26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crisis-false-alarm-by-stephen-s-roach-2016-01>

Roach, S.S.(2011) 'China's 12th Five-Year Plan: Strategy vs. Tactics'. 本文刊登在第十二届年度中国发展论坛, 2011年3月。New York: Morgan Stanley.

Guardian (2015) 'Timber companies paid CAR armed groups millions, claims report', *The Guardian*. 7月15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5/jul/15/central-african-republic-timber-trade-paid-millions-armed-groups>

Hirsch (2013) 'Ghana deports thousands in crackdown on illegal Chinese goldminers', *The Guardian*. 7月15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15/ghana-deports-chinese-goldminers>

ILO (2009)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Africa: Promoting transition to formality: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LO policy pape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Lescuyer, G. and Cerutti, P. (2013) 'Taking the Informal Sector into Account'. CIRAD Policy Paper 21. Paris: Le Centre d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en recherche agronomiqu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Livingston, G., Schonberger, S. and Delaney, S. (2011) 'Sub-Saharan Africa: The state of smallholders in agriculture'. IFAD Discussion Paper. Rom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erry, G.E., Maloney, W.F., Arias, O.S., Fajnzylber, P., Mason, A.D. and Saavedra-Chanduvi, J. (2007) *Informality: Exit and exclu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chneider, F. (2002) 'Size and Measurement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11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orld Bank Rapid Response Unit Pap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piegel, S.J.(2012) 'Formalisation policies, informal resource sectors and the de-/re-centralisation of power'. CIFOR Report.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Vorley, B., del Pozo-Vergnes, E. and Barnett, A. (2012) *Small producer agency in the globalised market*.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eng, X., Putzel, L., Kandulu, M.M., Ekman, S.M.S., Zafinikamia, M.L.B., Assembe-Mvondo, S., Cerutti, P.O. and Lescuyer, G. (2014) 'The Africa-China timber trade: Diverse business models call for specialised policy responses'. CIFOR Brief No. 28.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Weng, X (2015) 'The rural inform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drivers and livelihood impacts in agriculture, timber and mining'. IIED Working Pape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it, M. and van Dam, J. (2010) 'Chainsaw milling: supplier to local markets - a synthesis', in Wit and van Dam (eds.) *Chainsaw milling: supplier to local markets*. Netherlands: Tropenbos International.

World Bank (2008)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Growth with Governance in the Mining Sector*. World Bank Report No. 43402-Z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文 11

Allan, T. (2011) *Virtual Water: Tackling the Threat to our Planet's Most Precious Resource*. London: I.B. Tauris and Co.

Brautigam, D. (2015) *Will Africa Feed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ow, R. and Mason, N. (2014) 'The real water crisis: inequality in a fast-changing world'. ODI Discussion Paper.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Doczi, J., Calow, R., and D'Alancón, V. (2014) *Growing more with less: China's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ODI Development Progress Case Study Report.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ambaugh, D.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i, J., Liu, J. and Pinter, L. (2014) 'Recent evolution of China's virtual water trade: analysis of selected crop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policy', *Hydrology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18:1349-1357.

Water Footprint Network (2012) Website: <http://waterfootprint.org/en/water-footprint/>

Watts, J. (2010) *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 How China Will Save Mankind Or Destroy I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World Bank (2016a) Data Retrieved from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databa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World Bank (2016b) 'World Bank China Country Overview'. 在线网页信息。Washington DC:World Bank.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china>

文 12

Appleton, S. (2001) 'Education, Incomes and Poverty in Uganda'. CREDIT Research Paper 01/22. Nottingham: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ppleton, S., Bigsten, A. and Kulundu Manda, D. (1999)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declin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Kenya, 1978-1995'. CSAE Working paper 99.6. Oxford: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Appleton, S., Song, L. and Xia, Q. (2005) 'Has China crossed the river? The evolution of the wage 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during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5):644-663.

Atherton, P., Appleton, S. and Bleaney, M. (2012) 'International School Test Scores and Economic Growth',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65(1):82-90.

Brautigam, D. (2009)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u, C.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1076-1151.

Colclough, C., Kingdon, G. and Patrinos, H. (2010)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Wage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8(6):733-747.

Collier, P. and Gunning, J. (1999) 'Explaining African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64-111.

Eggleston, K., Ling, L., Qingyue, M., Lindelow, M. and Wagstaff, A. (2008) 'Health service delivery i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 *Health Economics* 17(2):149-165.

Hanushek, E.A. and Woessman, L. (2008) 'The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3):607-668.

Heckman, J. J. (2005) 'Chin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16:50-70.

Jeppsson, A. (2001) 'Financial priorities under decentralization in Ugand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6(2):187-192.

Kremer, M., Moulin, S. and Namunyu, R. (2003) 'Decentralization: A Cautionary Tale'. PAL Working Paper 1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bdul Jamil Lateef Poverty Action Lab,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ewin, K., Lu, W., Yuan, L., Wei-tao, Z., Tian-tian, W., Jie, W.Y. and Chang, Q. H. (2011a) *Education and Change in Rich, Poor and National Minority Areas in China: Two Decades of Transition*. CREATE Project Report. Brighton: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ccess, Transitions and Equit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ussex.

Lewin, K., Wasanga, P., Wanderi, E. and Somerset, A. (2011b)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enya: Improving Policy and Practice'. CREATE Working Paper. Brighton: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ccess, Transitions and Equit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ussex.

Lin, J.Y. and Liu, Z. (2000)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1):1-21.

Meng, Q. and Tang, S. (2013) 'Universal Healthcare Coverage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77:330-340.

Mwabu, G., Mwanza, J. and Liambila, W. (1995) 'User charges in government health facilities in Kenya: effect on attendance and revenue',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0(2):164-70.

Nabyonga, J., Desmet, M., Karamagi, H., Kadama, P.Y., Omaswa, F.G. and Walker, O. (2005) 'Abolition of cost-sharing is pro-poor: evidence from Ugand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0(2):100-108.

OECD (2009) *OECD Rural Policy Reviews: China*.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adelet, S. (2010) *Emerging Africa: how 17 countries are leading the way*. Baltimo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Reinikka, R. and Svensson, J. (2004) 'Local capture: evidence from a 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 program in Ugand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2):679-705.

Ridde, V. and Morestin, F. (2011) 'A scoping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abolition of user fees in healthcare services in Afric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6(1):1-11.

Song, L. (2011) 'China's Debt is a Time Bomb', *New York Times*. 7月6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1/07/06/chinas-debt-monster/chinas-debt-is-a-time-bomb>

Song, L., Appleton, S. and Knight, J. (2006) 'Why do girls in rural China have lower school enrolment', *World Development* 34(9):1639-1653.

UNDP (2012) *Afric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Towards a Food Secure Futur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ECA (2015) *MDG Report 2015: Assessing Progress in Africa towar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Report. Addis Abab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ESCO (2012) 'Opportunities Lost: The Impact of Grade Repetition and Early School Leaving',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Quebec: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NESCO (2014) *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HO (2005) *China: health, pov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O Report. Beijing: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Zhang, X. (2006)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nd inequal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4:713-726.

Zhang, X. (2013) 'Clusters as an Instrument for Industrial Policy: The Case of China' in Stiglitz, J. and Lin, J.Y. (eds.) *The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 The Role of Government Beyo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Zhang, X. and Kanbur, R. (2005) 'Spatial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6:189-204.

文 13

Alden, C. and Large, D. (2015) 'On becoming a norms mak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orms 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Security in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221:123-142.

CFR (2014) 'Remarks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at the Fourth Summit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Excerpt of speech.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cfr.org/regional-security/remarks-chinese-president-xi-fourth-summit-conference-interaction-confidence-building-measures-asia/p33637>

Child, A. and White, D. (2005) 'Chinese investors target virgin markets', *Financial Times*. 3月15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t.com/cms/s/0/4cd3fd20-94f7-11d9-8dd3-00000e2511c8.html#axzz45bZTHpnh>

DIRCO (2015) 'Declaration of the Johannesbur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Section 25.4, p.10. Pretori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dfa.gov.za/docs/2015/focac_declaration.pdf

Harlan, C. (2016) 'China's economic downturn is threatening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success stories', *Business Insider*. 2月1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uk.businessinsider.com/chinas-economic-downturn-is-threatening-one-of-the-worlds-greatest-success-stories-2016-2?r=US&IR=T>

Kachembere, J. and Majaka, N. (2016) 'China warns Zim over mine grabs', *Daily News*, 1 March.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s://www.dailynews.co.zw/articles/2016/03/01/china-warns-zim-over-mine-grabs>

MOFA (2015a), "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2016—2018)"。中非行动计划。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23159.shtml

MOFA (2015b), “开启中非双赢合作以及共同发展新纪元”。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2月4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21614.shtml

SCIO (2015), “中国的军事战略”。政府白皮书。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5/26/content_20820628.htm

Shen, D. (2011) 'South Sudan is A Testing Ground for China's Proactive (Shaping) Diplomacy', *Oriental Morning Post*. 7月12日。

Wee, S.L.(2015) 'China pledges to work with Africa in fighting militancy after Mali attack', *Reuters*. 12月4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africa-idUSKBN0TF08Y20151126>

Wu, Y. (2014) 'China's oil fears over South Sudan fighting', *BBC News*. 1月8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bbc.co.uk/news/>

撰稿人

Carlos Oya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Dan Large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Deborah Brautigam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Giles Mohan

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Hannah Ryde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海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亲善大使兼非洲制造计划首席执行官

林毅夫

北京大学

宋丽娜

诺丁汉大学 (Nottingham University)

Linda Calabrese

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 英国)

Roger Calow

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 英国)

Ross Harvey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Stephen Gelb

海外发展研究院 (ODI, 英国)

Terry McKinley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翁晓雪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IED)

吴御瑄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SAIIA)

本出版物中提出的观点仅
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
DFID、ESRC、SAIIA 或
ODI 的观点。

© DEGRP 2016

degrp.sqsp.com

研究由 ESRC 和 DFID 共同资助完成。